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 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

陳培豐**

摘 要

本論文將「漢文」這個概稱加以歷史脈絡化，試圖探討：東亞域內殖民統治下，臺灣一連串語文運動的意義或特徵。

臺灣在日治時期曾發生中國白話文運動，並出現以「中國白話文」書寫的文章。但這些現象並非突發性或由外部因素所造成的結果，而是以：(1)《臺灣教育會》雜誌所形成的「殖民地漢文」為內部基礎；(2)梁啟超訪臺為催化效用，兩者相互接融而成的一種文體共同體想像。以東亞的漢文脈來看，形構這個文體想像的基礎與養分是明治維新後的「帝國漢文」訓讀體；而「殖民地漢文」以及中國白話文也都是因為共同擁有這個基礎，才有互通接融的可能。對於帝國與臺灣來說，「帝國漢文」與「殖民地漢文」均是一種仲介「雙層語文構造」的工具，分別扮演了溝通當地不同身分、階級或文化背景之民眾的角色。

日治時期臺灣的「中國白話文」其實是一種以文體共同體想像為先，再經過事後追認命名的文化現象。而由於其不是既定目標的實行或達成，真正強韌落實在臺灣社會的是一個構成因素混雜，且無清楚所屬的「殖民地漢文」。也因此，當臺灣人察覺「中國白話文」這件時髦的語文想像外衣，並不符合自己身體尺寸時，便自然會主張更換另件外衣。1930 年代的臺灣話文論戰，便是基於這個需求所引發的論戰。

日本殖民統治下，不管臺灣的漢文脈如何的複雜弔詭，但臺灣人之間確實存在一個可以相互溝通的文體。只是在沒有行政、教育體系支援下，這個文體一直無法標準化、規範化、體系化，經常漂流不定，也一直被想像成不同「國籍」和所屬。而這個實際上存在，但又漂流不定、游離不已的文體，反映了臺灣這個東亞域內殖民地的特殊性。同時也正是近代臺語文的雛形。

關鍵字：啟蒙、仲介、殖民地漢文、《臺灣教育會》雜誌、文體共同體想像

* 本論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識字・書寫・閱讀・翻譯——1930 年代臺灣鄉土／話文論戰的意義和影響〉96-2411-H-001-052-MY2 之成果的一環；曾在 2008 年 8 月 2 日於日本愛知大學「帝國主義と文學」國際研討會進行口頭報告；論文審查過程中，承蒙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在此表示感謝。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08 年 10 月 23 日；通過刊登：2009 年 1 月 20 日。

- 一、前言
 - 二、領臺之前日本的漢文脈：「帝國漢文」
 - 三、《臺灣教育會》雜誌的誕生與影響
 - 四、做為近代化漢文雜誌先驅的《臺灣教育會》雜誌
 - 五、「殖民地漢文」之誕生與其意義
 - 六、藉由翻譯「帝國漢文」而殊途同歸的兩個文體：「殖民地漢文」與「中國白話文」
 - 七、文體共同體想像的形成與分裂
 - 八、結論
-

一、前言

日清戰爭後的明治 28 年（1895），臺灣割讓給日本成為其殖民地。雖然受到異民族的支配，但從 1910 年代後期開始，臺灣陸續發生中國白話文運動、臺灣羅馬字運動、臺灣話文運動等語文改革運動。這些運動基本上和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一樣，都是為了方便近代化的攝取或教育的普及，也和文學間產生密切的關係，更促成了漢文文體（style）的變化。然而，昭和 12 年（1937）隨著皇民化運動的展開，這些漢文便在許多媒體「自動廢除漢文欄」的情形下逐漸消失。¹

針對上述既有的臺灣語文改革運動史觀，筆者一直存有疑問：日本統治下臺灣與中國分別隸屬不同的國度，而中國白話文這個外來的新興語文，在沒有政府教育機構作為後盾，也沒有辭典作為語文標準的規範工具之艱難情況下，為什麼

¹ 有關漢文欄廢止，日本學者河原功與中島利郎都有相關研究。近期則有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面貌」〉（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還能在臺灣社會生根發展？² 縱然當時臺灣的中國白話文與標準的中國白話文之間有相當的落差；但即使如此，為什麼 1920 年代一個近似中國白話文的新文體能「忽然」被許多臺灣人理解、書寫以及閱讀？其萌芽成長的土壤是什麼？又在哪裏？而同樣的疑問，當然也存在於筆者對於 1930 年代臺灣話文運動的看法。

本文針對前述的疑問，希望以下列觀點和態度，來做為思考問題以及尋求答案的取徑：

（一）在殖民統治下，臺灣與日本擁有諸如漢詩文、儒教等共同的文化資產。在「同文」的前提下，臺灣的語文改革運動不可能脫離統治者的「文脈」單獨進行，而成為兩條互不相干的平行線，必然和日本近代的漢文產生錯綜複雜的扣連、交混或借用關係。據此，本文將在日本近代語言、文學、文體的發展座標上，來分析或探討臺灣的語文改革問題。

（二）本文將試圖把「漢文」由分析概念轉換為分析對象。理由是：「漢文」這個概括式的稱呼，原本是日治時期歷史現場的稱呼而經常被拿來當做「日文」（在書寫上混合假名和漢字兩種表記）的對照性概念來看待。然而，儘管都是以漢字所羅列出來的文體，但不同時期的漢文有不同的文體特徵，這些文體特徵含攝著不同的社會功能與政治意涵，是不同歷史脈絡下的產物。簡單的說，明治 28 年（1895）《臺灣新報》與昭和 19 年（1944）《南方》這個兩個刊物中的文章，儘管都是漢文，但文體卻有極大的差異。在近半世紀的日治時期，臺灣存有著以各式各樣漢文進行書寫的刊物和漢文欄。如果我們僅衍用「漢文」這個慣稱，卻不去正視作品的性質和文體的演變特徵為何的話，那麼臺灣殖民統治之複雜現象，將被單純化、平面化。隨之，我們將失去以更細緻而精準的視野，去看待歷史的機會。

為了讓漢文不再只是歷史現場的慣稱，而是一種符合其實質內涵、歷史縱深與社會身分的文化所產；本文將在較為細緻的文脈系譜上，給曾經流通在日治時期臺灣的各種漢文一些新的定位，以便為歷史找出嶄新詮釋的可能。

² 有關辭典與語文之規範化、標準化的關係，請參考安田敏朗，《辭書の政治学：ことばの規範とはなにか》（東京：平凡社，2006）。

二、領臺之前日本的漢文脈：「帝國漢文」

(一)中日文化連體嬰關係的臍帶：漢字漢文

眾所周知，日本語這個文字系統是由平假名、片假名以及漢字，也就是「漢和混融文」所形構而成。平假名、片假名以及漢字這三種表記符號看似不同，卻都淵源於中國。換言之，如果我們將語言分成聲音和文字兩部分來思考，日本人真正擁有的日本語其實只有聲音，其表記符號則直接或間接均來自中國。

上古時期在假名這個由漢字簡化而成的符號「發明」之前，日本人完全借用中國的漢字做為表記語言的工具。也因此，日本重要的建國史料或神話如《古事記》、《日本書紀》，或祝詞等與祈神有關的文獻，都是以漢字來書寫。這種和中國共用漢語的情形，到了奈良時代（710-794）都沒有改變。直到中古時期，日本人才將漢字簡化成「假名」。³ 日本攝取中國的語文，主要是基於政治或文化上的理由，其不同於拉丁文是以傳教目的為途徑傳入歐州。因此，相對於拉丁文在傳入之初即滲透到一般民眾之間，漢字漢文在日本社會的普及層面則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具體而言，漢字漢文是男性和貴族等社會上流人士所使用的書寫工具，擁有剛勇和權威的社會印象；相對於此，使用「假名」這種變形漢字書寫所謂「和文」者，通常只限於女性。⁴

日本社會中這種文體分立的情形，一直到十六世紀的中世依舊沒有改變。不過，十六世紀後期隨著佛教、禪宗以及儒教的流傳，大量的漢字漢文也隨之闖入日本。佛經的普及與戰記文學的興起，一方面使漢語流通在日本社會的情形更加快速明顯；另一方面，也促使漢文變得更具混雜性。此際，原本以階級、性別做為主要分際的文體，開始有了混融的跡象。

江戶時代由於出版資本主義的發達，日本文學走向燦爛期。然而這個蓬勃燦

³ 在八世紀的日本，知識分子依然只依賴漢字來從事自己的文學和政經活動，《風土記》以及著名的《萬葉集》都是以漢字創構的萬葉假名來表記。奈良時代（751年），日本更出現了《懷風藻》這本最早的漢詩集。

⁴ 加藤徹，《漢文の素養：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參考第二、六章。

爛的背後卻隱含著兩個意義：其一，文學開始由貴族手中，擴散到了百姓庶民的社交圈。因此，以假名參雜漢文，也就是「和漢混和文」所書寫的文學，例如俳句、戲曲、川柳等開始打破了階級和性別的界線，在民間大放異彩。另一方面，由於德川幕府崇拜佛教，並奉儒教為官學，因此知識分子崇奉漢詩文，並且將「支那」識為知識學問的象徵所在。為此，江戶時期成為日本漢詩文的鼎盛時期，一些著名的儒者為了徹底模仿「支那」，除了頻頻創作漢詩文外，甚至還建議放棄道春點、一齋點、後藤點等日本人在各時期為讀取漢詩文而創造出來的種種訓讀法，而完全採用中國音韻念讀這些漢詩文。⁵

其實，雖然借用了漢字做為日本語文的表記工具，但為了保持自己的音韻，不管是漢詩或漢文都有一些讀法上的機關與裝置，讓日本與中國之間存在著「同文不同調」的關係。而這個區隔關係的存在，也為日文這個與中文如同連體嬰似的東亞語文保持了明顯的自主性。

日本在語文上之所以和中國產生綿密的關係，教育內容的漢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古代「大學寮」是培養漢文化的溫床。江戶時代，日本的教育系統大致分成由幕府或「藩」等統治者以培養武士子弟為目標所設置的學校，以及以商人和老百姓等為教育對象的寺子屋。前者主要教授漢詩文，後者則以教授「和漢混合文」為主。在明治維新期間，日本雖然揚棄了「支那」，而把國家建設目標以及知識模仿對象轉向西洋，但是在明治5年（1872）政府設立的學制中，小學課程並沒有「國語科」，而只有「拼字」、「習字」、「單語」、「會話」、「書牘」、「文法」等七個不統一的科目。然而，這些有關日本語的教材與漢文教材，基本上是混和在一起的。⁶ 換言之，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雖然標榜脫亞入歐，但一個脫離漢字且輪廓鮮明的國語卻未因此出現。對日本而言，理論上明治維新應該是其徹底清理與中國語言文學隸屬關係的最好時機。不過，這個標榜文明開化的劃時代文化革命，不但沒有促使日本脫離中國，反而與漢字漢文結下另一種新的夥伴關係。

⁵ 村山吉広，〈漢文脈の問題：西欧の衝撃のなかで〉，《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25: 10（1980年8月），頁40-45。而這些主張最後雖然沒有實踐，但其思維明顯意味著日本人對於自己在語言音韻上所保有的自主性之放棄和動搖。再者，為了讓自己的漢人色彩更加濃厚，許多儒者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像賴山陽、林羅山等類似中國人的姓名。

⁶ 有關這方面請參照伊藤喜代治，《近代日本語と漢字》（東京：明治書院，1997）；森岡健二，《日本語と漢字》（東京：明治書院，2004）。

明治維新之際，日本人將文明與學問的定義所在，由「支那」轉向西洋。在這段時期，日本為了吸收西洋文明，必須大量翻譯西洋的著作。而為了因應或傳達西方在歷經文藝復興運動與產業革命後累積的知識資產——新的概念、思想、物象、科學、哲理、法律，日本的知識分子創造為數頗多的新語彙。隨之，日本的語言與文章的形式特色——「文體」，也在這個近代化過程中產生重大的變化。諷刺的是，維新後「棄中就西」的日文，卻反倒出現了為數更加龐大的新造漢字語彙。除了「關係」、「規則」、「歸納」、「社會」、「經濟」、「權力」、「概念」之類的二字語彙外，例如「文明開化」、「自由平等」、「舊弊頑固」、「王政復古」等，也是當時盛行或新造的四字成語。⁷

明治初期日本社會最流行的一句話，便是「今日之參議皆書生」。由這個現象來看，江戶時期的結束不但沒有讓漢詩文式微，反而造成了大量的流行。⁸

(二)做為一種翻譯裝置的漢文訓讀體

在歷史上日本與漢字漢文的關係，只有程度深淺或影響多寡之分，從來不存在間斷或有無層次的問題。江戶末期為了擺脫漢字漢文對日文的影響，日本開始萌發所謂的國語國字運動，其出發點便是要廢止字體繁瑣的漢字漢文，以便確立一個足以適應近代化生活的日文。然而，從國語國字運動的目標設定與明治維新時漢字漢文再次滲入日本的實際結果來看，日本語文或文學的發展過程，其實便是一部和漢字漢文這個「不可避的他者」不斷纏鬥卻又無法真正脫身的歷史。⁹

正如同「同文不同調」這句話所象徵的，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漢字漢文，其連

⁷ 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收於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頁463。

⁸ 在近代化運動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漢字漢文為什麼會再度受到寵愛？其主要原因有：

1. 明治維新之際，為了國事，全國諸藩的人士必須奔波各地並相互交換意見。然而由於受到日本各地方言腔調的阻礙，這些國事上的商討經常遭遇困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只好繼續利用漢文表意功能的優點以及江戶時代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漢詩文能力，盡量以漢字做為語言工具。
2. 在明治初期和政治社會有關的言論大為流行。漢文所具有的簡勁、強力印象，在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說或是建白書、公文書甚至勅語時，均可發揮權威性的威望印象。也因此例如「五箇條ノ御誓文」（「五箇條御誓文」）、大號令等明治維新中最重要的詔勅類或政治文獻，都是以漢文來書寫頒布。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頁463-464。

⁹ 有關漢字與日本的關係，請參考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2003）。

體嬰似的關係其實只存在於「文」，也就是書記文體上。在聲音方面，兩者間不管在任何時期，都呈現明顯的差異。而日本的國語國字運動既然是一個以追求語文近代化，亦即以「言文一致」做為主要目標的語文改革運動；那麼在明治期間的日文文體，便不可能依舊保持江戶時期那種高度近似中國漢詩文的文體形態。如前所述，江戶時期日本的道春點、一齋點、後藤點等原本就是為了讀取漢詩文所創造出來的訓讀法，明治維新前後，一些新的訓讀法也各自延展出新的漢文訓讀文體，造成了文體林立、混亂不一的現象。¹⁰

對於日本而言，訓讀漢文原本就是一種以便宜行事方式，讀取由中國漢字漢語形構的文語體之技法。¹¹ 因此，說穿了，漢文訓讀文體其實便是日本人為了翻譯中國儒學、佛經、禪宗或漢詩文時所產生的一種「中文日化」文體的變遷結果。更具體的說，這種以解讀中國古典文語體為目的所產生的文體，便是所謂的漢文訓讀體（以下簡稱訓讀體）。既然訓讀體是日本人為了翻譯漢文演化而出的文體，那麼這個「分身」和做為「本尊」的中國漢文之間，便存在著相當類似的現象。以下兩個文例，便是明治期間的漢文訓讀體。

妃ガ曰ク、諾哉、願クハ郎君之ヲ和セヨ。妙音丹唇ニ發シ、哀聲皓齒ニ清響忽變ジテ牢落凌厲、逸氣奮勇繽紛交錯ス。四坐唱和スル數回、范卿更ニ古詩ヲ朗吟ス。（例文一）¹²

来九月九日、鉄道開業式被為行候ニ付本日品川ヨリ横浜ノ間、汽車運轉休業……壬申八月廿五日太政官（例文二）¹³

由上例可以清楚發現，漢文訓讀體在書寫形態上非常接近漢文。然而，以訓讀來讀取或表記時，由於語句的前後順序會產生變化，語彙或文法也必須回歸口語文

¹⁰ 加賀野井秀一，《日本語は進化する：情意表現から論理表現へ》（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2），頁22-23。

¹¹ 齋藤希史，《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7），頁67；波多野太郎，〈漢文訓読の問題と助辞〉，《文法》3:3（1971年1月），頁48-59。

¹² 中譯：「妃曰：諾哉，願郎君和之。妙音發於丹唇，哀聲皓齒激昂。（中略）清響忽變牢落凌厲，逸氣奮勇繽紛交錯。四坐唱和數回，范卿更朗吟古詩。」原文取自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東京：岩波書店，1989；1885年原刊），日本近代思想體系16文體。

¹³ 中譯：「九月九日，將舉行鐵道開業典禮，因此自品川至橫濱之間，火車停駛……壬申八月廿五日太政官」原文取自《東京日日新聞》，1972年8月28日。轉載自小島憲之，《日本文学における漢語表現》（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387。

的關係，以及文體中片假名或平假名的要素，導致其逐漸偏離了漢文的形態，否則「文」在視覺上所顯現的效果和中國的漢文並沒有太大的差異。¹⁴ 再加上有些訓讀體往往將漢文和其翻譯文，以並列傍訓的方式來呈現。因此，日本人在書寫漢文訓讀體時，基本上必須具備中國漢詩文的基礎，先模仿或理解中國的文體後才能掌握一定的書寫能力。換言之，一些訓讀體如果去除了假名、傍訓或一些特殊讀取記號後，往往可還原或恢復成「本尊」中國古典漢文的模樣。¹⁵

訓讀體是一種具有機關暗號的漢詩文解讀裝置。其既然是以漢字漢語這種表意文字做為表記基礎，因此除了可以聲音誦讀外，當然也可以透過視覺辨識理解。¹⁶ 所以，從文體的特色來看，對日本人而言，訓讀體是以中國語文為基礎背景的日本語文；¹⁷ 但對中國而言，只不過是一種經過特殊處理或翻譯後的「和式漢文體」。而中國人對這個保留了許多漢字漢語的文體，不但具有熟悉感，甚至也可以閱讀。

訓讀體讓日本這個原本沒有文字的國家，得以在中國文明的全盛時期快速攝取或順利消化知識，同時也藉此豐富自己的語言文化。然而，縱使訓讀體中的假名或記號，得以讓日本在中國文明的巨大身影下保住文化的自主性；但在共有漢字漢文的前提下，一個語文上揮之不去的類似，卻使日本文化無法脫離漢字漢文而獨立運行。就算日本在甲午戰爭時一舉擊敗中國，搖身一變成為在軍事、政治上支配臺灣的帝國，這種文化連體嬰式的關係也依然沒有切斷。

(三)領臺前夕「帝國漢文」的出現與盛行

訓讀體是近代日本的重要文體，是日本人吸收知識的主要通路。然而在江戶時期或明治初期，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具有讀寫這個文體的能力。因為在達成近代化之前，日本社會並不具有一個表記方式穩定，且具有普遍性的語文。隨著性別、階級、教育等差異，日本各階層之間的語文存在相當程度的隔閡。江戶末期，訓讀體基本上只流通在貴族、武士等上層社會；而後經過一連串社會演變後，到

¹⁴ 原田種成，〈漢文法の要点〉，《文法》3: 3 (1971年1月)，頁13。

¹⁵ 波多野太郎，〈漢文訓読の問題と助辞〉，頁56。

¹⁶ 内田泉之助，〈原漢文か書き下し文か〉，《文法》1: 13 (1969年10月)，頁19。

¹⁷ 頼惟勤，〈語学か文学か〉，《文法》1: 13 (1969年10月)，頁16。

明治期才逐漸滲透、普及至社會各階層。¹⁸ 而訓讀體的普及，和日本媒體生態發展也有相當密切的關連。

近代日本的文體，因性別、階級、教育、功能之不同而分離相異。至明治初期，流通在日本社會的各種文體，最多時竟高達 8 種。¹⁹ 這種多元而紛雜的文體狀態，也同樣反映在新聞媒體的發展過程中。

明治初期的日本社會，流通著兩種形式、內容、文體、讀者都不盡相同的新聞，即「大新聞」與「小新聞」。「大新聞」的內容，主要是報導政治或相關政論，執筆者以自由民權運動的志士占了大部分；讀者則以官僚、知識分子為主，性別上以男性居多。「大新聞」的文體，雖然有純漢文以及加上傍訓或返折點式的兩類漢文，但均屬於生硬的文語體，漢文要素非常濃厚。前述所舉的文例二，便是典型的「大新聞」文體。

相對於「大新聞」，「小新聞」的讀者當中，商人、技職工出身的平民、婦人、少年占了大部分，其內容以風花雪月的輕鬆議題為主。而「小新聞」刊載內容比較生活化，議題也比較輕鬆活潑，再加上大部分讀者不懂艱難的漢文，因此必須減少漢文的比例，增加俗語，形成「小新聞」較口語化的文體特色。以下便是明治 7 年（1874）11 月 2 日《讀賣新聞》中的文章，屬於小新聞的文體：

このしん し おんなこども ため ことがら だれ わか
此新ぶん紙は女 童のおしへにとて為になる事柄を誰にでも分るや
うにかい つもり みみぢか ためになる ぶん はなし
うに書てだす趣旨でござりますから耳 近い 有 益 ことは文を談話の
やうに したため お な ところ よせぶみ ひとへ ねが
やうに 認 めて御名まへ 所 がきをしるし投書を 偏 に願ひます。²⁰

明治初期，大、小新聞為了因應讀者需求而各自發展文體的媒體生態，讓口

¹⁸ 清水賢一郎，〈梁啟超と「帝国漢文」：「新文体」の誕生と明治東京のメディア文化〉，《アジア遊学》13（2000年2月），頁26。

¹⁹ 在明治初期流通在日本的文體至少有：(1)沒有訓點或句豆點的純漢文，(2)有折返點的漢文，(3)漢文和片假名交混的和漢折衷文體，(4)漢文與平假名交混的和漢折衷文體，(5)使用在信簡上的訓讀式候文，(6)具洋文色彩的和文，(7)擬古式的和文體，(8)「ゴザル式」的講述文等八種。參見加賀野井秀一，〈日本語は進化する〉，頁22-23。

²⁰ 中譯：「此報紙是為了婦女與學童的教育而以任何人都讀得懂的方式刊載有用的事情為宗旨，所以懇請將身邊的有益事項用口語書寫填上姓名地址來投稿。」原文取自《読売新聞》，1874年11月2日。轉載自土屋礼子，〈大眾紙の源流—明治期小新聞の研究—〉（京都：世界思想社，2002），頁65。

語體與文語體兼具並存，也讓日本社會形成了兩極化的「雙層語文構造」。在挾帶厚重漢文的文語體和由漢文、假名構成的口語體同時瓜分媒體市場的狀況下，一個在書寫閱讀上具有普遍性、流通上具有高效率的統一文體，並不存在於當時的日本。然而明治 20 年代，以小新聞發跡的《讀賣新聞》雇用了知名的政治家、文藝評論家高田早苗為主筆，開發出所謂的「中新聞」路線。這個路線的成功，便讓原先大、小新聞各自盤據一方、僵持不下的狀況，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變。

「中新聞」的內容恰如其名，是一種不管在形式、內容、文體與讀者設定上，都折衷大、小新聞特性，而往中間靠攏的新式新聞。其文例如下：

青年も読むべく、婦人も読むべく、都会の人読むべく、地方の人読むべく、(中略)而して其文字直裁平易にして紙面純潔清白なれば男女學校に於ても、殊に嚴肅なる家庭に於ても之を購求するに於て遲疑するを要せざるべし。²¹

「中新聞」選擇的是一種綜合大小新聞優點的中庸路線，因此在書寫文體上係採用訓讀體或振假名。²² 同時，因為「中新聞」的文體和「大新聞」相較顯得更為淺顯易懂，內容又比「小新聞」充實，發行之後廣受歡迎。「中新聞」的暢銷，促使當時的大、小新聞開始調整原有的經營路線而模仿之，不久「中新聞」便成為日本媒體的主流。²³

「中新聞」的出現，改變了日本的媒體生態，而這種標榜中庸的報紙，對於日本的影響比我們的想像要來得深遠。因為隨著報紙的暢銷和普及，做為文章載體的訓讀體，便發揮了仲介「雙層語文構造」中兩種極端文體的「翻譯」作用，讓原本各據一方、距離遙遠的文體和讀者有了交集。更具體的說，由於訓讀體剛好介於漢文、俗語或文語體以及口語體之間，是大、小新聞讀者可以調整適應並接受的文體。因此，透過這種文體的流行，連帶使大、小兩種新聞與讀者之間產生交融，原本因為性別、階級、教育、需求的不同而有所隔閡的兩群讀者「小眾」，

²¹ 中譯：「青年可讀，婦人亦可讀，都會人亦可讀，鄉下人亦可讀，(中略)而其文字簡潔平易且版面潔白，不管於男女學校或嚴肅家庭，皆不必遲疑購買之。」原文取自《國民之友》，1890 年 1 月，這是附錄中所刊載的廣告文。參考自杉井六郎，《德富蘇峰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5；1977 年原刊)，頁 138。

²² 振假名便是在漢字旁，為了標示讀法而寫的假名。

²³ 清水賢一郎，〈梁啓超と「帝国漢文」〉，頁 31-34。

也得以連結成共有同一文體的「大眾」。

換言之，「中新聞」利用訓讀體這個中性書記文體，達成語文之間相互穿透或連結的效果。而訓讀體之所以能穿透漢文、俗語或文語體及口語體，原因在於這個文體「並不具有地方或歷史的特色」、「是一種萬人皆宜」、「以文語體來說話」的文體。透過「中新聞」的普及以及流行，訓讀體讓讀者在閱讀、摹寫、熟悉的過程中，逐漸打破「雙層語文構造」，使「大新聞＝漢文＝書記語」與「小新聞＝俗語＝口語體」的界線變得模糊、曖昧甚至消失，而融合為一。²⁴

明治中期訓讀體迅速成為日本讀者的主要閱讀經驗。德富蘇峰這位日本歷史家、著名的媒體人也在此際以「中等社會」為目標設定讀者，創立了屬於「中新聞」的《國民新聞》。爾後，《國民新聞》雖然改名為《國民之友》，但無論雜誌名稱為何，這本刊物的立論或主張在當時的日本都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其所以能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再怎麼說，便是因為那個充滿魅力的文體」。²⁵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 22 年（1889）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及隔年發布的全日本國民都被強制要求暗誦朗讀的教育勅語，都是使用訓讀體。除了這兩個象徵日本帝國的「聖典」外，政府的公文書、國會的會議發言記錄，也都使用訓讀體。在有了帝國力量做為後盾後，訓讀體做為國家行政權力運作的書寫工具，在迅速滲透到民間的同時，無形中也被賦予威望和信賴感。經過日本政府的介入與一番整頓後，這個隱含濃厚國家色彩的文體，便順理成章地成為近代日本國語的雛型。²⁶

以文體成立的角度來看，訓讀體具有深遠的歷史脈絡。因為雖然僅流通在部分特權階層間，但訓讀體其實在江戶時代便已存在。以日本近代史的角度來思考，訓讀體的流行與普及則象徵了日本帝國的誕生，更是近代日本掌握政經運作的主要工具。為此，清水賢一郎便賦予這個文體一個新的稱謂「帝國漢文」。²⁷ 帝國漢文的普及和定型，剛好就在日本領有臺灣之際。總而言之，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這個文體便在甲午戰爭後由日本引進臺灣，成為媒體刊物的主要文體。

²⁴ 清水賢一郎，〈梁啓超と「帝国漢文」〉，頁 31-32。

²⁵ 清水賢一郎，〈梁啓超と「帝国漢文」〉，頁 31-32。

²⁶ 清水賢一郎，〈梁啓超と「帝国漢文」〉，頁 27-32。

²⁷ 清水賢一郎，〈梁啓超と「帝国漢文」〉，頁 26。

三、《臺灣教育會》雜誌的誕生與影響

(一)日治初期古典漢文的復活

甲午戰爭後日本領有臺灣，並開始進行為期約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日本支配臺灣時，雖然以「國語」同化教育為重要施政方針，但是為了和臺灣人溝通、傳達法令以利施政的推行，必須有一個雙方都能理解的語文工具。然而，十九世紀末，在臺灣這塊異民族所居住的帝國領土上，漢字漢文才是知識分子書寫閱讀的主流工具。為此，統治者在占領臺灣後必須重新回到歷史，利用「同文」之便，把在日本媒體界已被「帝國漢文」取代的純漢文，再度搬上殖民地的政治舞台，作為治理臺灣的道具。其理由乃是：雖然「帝國漢文」已普及於日本內地，但是對於沒有學習過日文的臺灣人來說，「帝國漢文」只是統治階級的文體。這些摻雜了假名的訓讀體，對於被統治者而言是陌生的、甚至不解的。

很諷刺的，由於領有海外殖民地的關係，稱霸於日本國內的「帝國漢文」反而必須在臺灣退居到第二線。因為在殖民地中，「帝國漢文」這個訓讀體並不具備其在本國的優點特色：「並不具有地方或歷史的特色」、「是一種萬人皆宜」、「以文章語來說話」的定義。有趣的地方在於，在共有漢字漢文這個特殊殖民情境的情況下，「帝國漢文」的前身，也就是訓讀體改良進化之前的文體，亦即甲午戰爭前日本知識分子熟悉，卻幾乎已被棄之不用的「支那式」古典漢文，才是殖民地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萬人皆宜」的通用文體。

前面業已說過，日文的發展，其本身便是一個脫漢的奮鬥過程。日本的語文基本上借用自中國漢字，其後雖然發展出假名，但時間越往前追溯，文體中的漢字（中國要素）便越益濃厚。然而由於占領了臺灣，為了統治上的便利，這個新興帝國卻又必須回過頭來，把過氣本尊也就是支那的舊文體漢文，搬到新領土上來使用。明治 29 年（1896）6 月，《臺灣新報》這個日治時期臺灣最早的報紙在創刊之時，就是以日文欄和漢文欄並列的方式發行，而這裏所指的日文，基本上就是「帝國漢文」訓讀體。

《臺灣新報》中漢文欄的文章，除了漢詩之外，大部分是「府令公布式」等

政令宣達。換言之，將臺灣總督府的重要命令由日文翻成漢文，是漢文欄初期的主要任務。因此，在甲午戰爭後，臺灣並沒有立即出現一個專門以承載近代化內容為宗旨的漢文欄，直到明治 31 年（1898）5 月，《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合併成《臺灣日日新報》後，具有體系性以及評論、報導意義的漢文欄，才正式宣告誕生。²⁸

更具體的說，日治初期一些報紙或雜誌漢文欄的主要功能在於傳達政令、刊登漢詩或進行簡單的時事報導。這些艱澀生硬的文語體，往往不設標點符號或斷句，有時甚至還押韻或引經據典。因此，以日本近代媒體發展中的文體生態，也就是以「大新聞、文語體」和「小新聞、口語體」做為座標來思考，《臺灣新報》、《臺灣日報》以及早期《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幾乎是位居在「大新聞、文語體」的極端位置，瀰漫著古典漢文的色彩。²⁹ 其文例如下：

天地間人物消長皆陰陽二氣所流行也氣之相感其機甚微而其生滅則靡窮故時值二氣調和則人物康安無虞災癘時值天氣之暑寒不順地氣之濕毒交加³⁰

領臺初期臺灣報紙漢文欄的文體屬性，由這些報紙曾經雇用章炳麟這位清朝著名文士和內藤湖南這位漢文造詣精深的中國文化歷史專家為編輯，便可窺見一二。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宣達政令之外，上述報紙漢文欄中的漢文與日文欄之間，也不具有明顯的對譯關係。縱使出現意譯式的翻譯報導，其篇幅通常不是很長，而這些對譯文章也往往不是在同一天出現。不過，這種漢文欄與日文欄之間的疏離，以及古典漢文色彩濃厚的現象，卻在明治 36 年（1903）後逐漸有了改變。促成這個變化的媒體，則是曾經在臺灣發行 44 年之久的《臺灣教育會》雜誌（以下簡稱《臺教會》雜誌）。

²⁸ 李承機，〈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出版社，2004），頁 203。

²⁹ 到了明治 38 年（1905），日俄戰爭等因素帶給臺灣日日新報社好景氣，並且為了與內地的大眾報紙競爭而需要開拓臺灣人讀者，從 7 月 1 起《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獨立，名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頁數增加為 6 頁，目的為當作官方和臺灣人的橋樑，而開始與日文報分別發行。參見李承機，〈殖民地新聞としての《台湾日日新報》：「御用性」と「資本主義性」のはざま〉，《殖民地文化研究》2（2003），169-181。

³⁰ 《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5 月 8 日，第 3 號，頁 1。

(二)《臺灣教育會》雜誌及其漢文欄

明治 33 年（1900）6 月，為了「國語」同化教育能順利推行，日本教育相關人員成立了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會背後有殖民政府做為後盾，成立的隔月便開始發行機關誌《臺灣教育會》雜誌。之後，一直到昭和 18 年（1943），《臺教會》雜誌雖然改換過幾次名稱，但仍持續發刊，成為日治時期在臺發刊最久的雜誌。³¹

由於《臺教會》雜誌是「國語」同化教育之重鎮，再加上在「國語」同化教育中，漢文地位尷尬曖昧；因此，不同於《臺灣日日新報》等前述報紙媒體，這個雜誌在開始設置時便以自己為表率，全部以「帝國漢文」訓讀體作為書寫的工具，而沒有設置漢文欄。不過，到了明治 35 年（1902）12 月 20 日，在總督府學務課召開的臺灣教育會幹事會議中，基於和臺灣人教員同心協力振興教育的理由，討論漢文欄設置事宜，並當場獲得編輯委員三屋大五郎擔任漢文欄主任之承諾。³² 因此，會議中決定，從明治 36 年（1903）1 月《臺教會》雜誌第 10 號開始設置「漢文報」。

《臺教會》雜誌漢文欄的設置，是為了爭取臺灣人加入臺灣教育會組織。隨著「國語」教育的普及，公學校中為數頗多的臺灣人教員，儼然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但是，由於臺灣教育會採取會員制，雜誌設置初期臺灣人入會者卻很少。臺灣人教員不積極入會的原因，被認為與「新附民」尚不熟悉日文，雜誌中又沒有設漢文欄有關。因為這些臺灣人教員雖然具備日文能力，但對古典漢文更具熟練與親近感，缺少漢文欄，就等同剝奪他們的教學參與感及啟蒙權。換言之，

³¹ 《臺灣教育會》雜誌在創刊當初是三個月出刊一次，從第 6 號（明治 35 年〔1902〕8 月）開始變為兩個月發行一次。從明治 36 年（1903）10 月第 7 號改為月刊，明治 45（1912）1 月發刊第 117 號起改稱《臺灣教育》，直到昭和 18 年（1943）由於官方發刊的雜誌被統合為一部而廢止，總共發刊 498 號。參考蔡茂豐，《中國人に対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台湾を中心に》（臺北：撰者印行，1977），頁 338。

³² 三屋大五郎出生於 1864 年，卒年不詳。號清陰，越前人，1897 年任宜蘭國語傳習所教諭，1900 年任臺中師範助教授，《臺灣新報》時期，即偶有詩作。後任國語學校教授、廈門同文書院長、嘉義中學校長，曾任《臺南新報》漢文主筆、工詩書畫，1928 年曾任嘉義詩社「鴉社」顧問。參見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出版社，2000），頁 178。

漢文欄設置之目的，一來是為了籠絡，二來是為了啟發臺灣人教員。³³事實上，設置漢文欄後，臺灣人會員顯然有所增加。明治 36 年（1903）6 月，總共 68 名的新加入會員中，臺灣人便占了 51 名；7 月的 20 名入會者中，臺灣人也有 13 名之多；8 月入會者雖然只有 1 名，但就是臺灣人；而 9 月的 56 名入會者中，臺灣人占了 48 名；10 月 69 名入會者中，臺灣人也有 37 名。11 月、12 月，雖然僅有 7 名入會者，但全都是臺灣人。總而言之，在漢文欄設置後一年的明治 37 年（1904）1 月，在 757 名會員中，臺灣人已達到 200 名以上。³⁴

《臺教會》雜誌漢文欄設置之初，每期有大約 20 頁的紙幅。直到昭和 2 年（1927）12 月第 304 號，也就是漢文欄廢止時，每期一直都維持差不多 8 到 16 頁的篇幅。³⁵讀者或投稿者，大部分都是與教育有關的人員。因為做為一個機關誌，《臺教會》雜誌主要提供給臺灣教育會相關會員閱讀。這些會員以學校教職員為多，另外還有擔任臺灣教育行政的學務課、編修課等職員。各州廳的教育課等地方政府職員，銀行及郵局、圖書館等公共機關的職員，也都是這個雜誌的會員或讀者。³⁶

由於臺籍會員多有教職身份，又根據明治 37 年（1904）1 月的統計，《臺教會》雜誌的學校職員佔會員的一半以上，因此《臺教會》雜誌在臺灣人教員中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與閱讀率。例如，明治 45／大正元年（1912）國語學校的臺灣人畢業生，每年都開辦同學會，而這個聚會的通知及連絡事項，就是以刊登消息在漢文欄的方式來進行。另外，國語學校教授兼艋舺公學校主事鈴江團吉過世之際，為了紀念，漢文欄上即刊有募集捐款的啟事。由其捐款者幾乎都是臺灣人來看，我們大概可以得知，當時有非常高比例的公學校體系臺灣人，都是這個雜誌的讀者。

³³ 根據《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9 號的會員名單，當時臺灣教育會會員有 430 餘名，其中臺灣人會員只有 47 名。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既然要把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且臺灣教育會又以臺灣教育的普及與改進為目的，因此如何增加臺灣人會員，便成為重要課題。參見佚名，〈明治三十五年之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會》9（1902 年 12 月），頁 2。

³⁴ 此數字乃是室屋麻梨子根據《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15 至 21 號的會員名單，所做的統計結果。參見室屋麻梨子，〈《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66。

³⁵ 昭和 3 年（1928）1 月第 305 號開始，《臺灣教育》中有關漢文的部分，幾乎只留下在文藝欄的幾篇漢詩文而已。

³⁶ 不只在臺灣，還有廈門、福州、汕頭等總督府南進據點的學校職員等也是會員。

《臺教會》雜誌的漢文欄，雖然在沒有公告下，於昭和2年（1927）12月斷然撤除，但總計發行了25年之久。³⁷ 日治時期臺灣出現許多附有漢文欄的雜誌，但發行壽命最長者，仍屬《臺教會》雜誌。根據筆者的觀察，臺灣人之所以接受《臺教會》雜誌，原因應該與雜誌的內容充實有關。

四、做為近代化漢文雜誌先驅的《臺灣教育會》雜誌

（一）啟蒙性、知識性、近代性與對譯性

《臺教會》雜誌日文欄的內容以討論臺灣教育為主，以其第1號為例，共132頁的雜誌中，有「論說」、「學術」、「實驗調查」、「文藝史傳」、「雜錄」、「質疑應答」、「圖書介紹」、「內外彙報」、「會報」、「公文」等專欄，幾乎每期相同。除此之外，雜誌也視情形機動性增加一些如「時事一斑」、「地方通信」、「敘任辭令」等具情報性的專欄。從這些專欄的編輯配置，我們可清楚的理解：《臺教會》雜誌具有宣揚政令、連繫政府與教育工作人員情誼的任務。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臺教會》雜誌內容的主題雖然是教育，但也有相當份量的篇幅報導或記載與科學、生物、語言學、軍事等相關的啟蒙知識。此外，還有一些報導皇室動向、世界及日本內地的新聞、政治、軍事等時事性的文章。承載這些內容的主要文體無他，便是當時普及於內地以及開始滲透到臺灣媒體的「帝國漢文」訓讀體。「帝國漢文」與漢文雖然不同，卻具有某一程度的近似性。下面的例文，便是《臺教會》雜誌中的文章。

回顧スレバ明治二十九年本島ガ日清戦争ノ結果トシテ將タ紀念トシテ我帝國ノ範圍ニ歸シ以來既七星霜，本島ノ經營ハ我國人ガ佔領地經營ノ初舞臺ニシテ世界各國ノ等シク注目スル所ナラム。³⁸

³⁷ 佚名，〈會報〉，《臺灣教育會》10（1903年1月），頁62-63。

³⁸ 中譯：「回顧起明治二十九年本島作為甲午戰爭的結果和紀念而歸屬於我帝國範圍以來已七星霜矣。本島之經營為國人佔領地經營之第一個舞台而為世界各國所矚目。」原文取自高岡武明，〈公學校ノ修身化ニ就キテ〉，《臺灣教育會》4（1902年3月），頁1。

至於漢文欄方面，在發刊初期除了少部分漢詩外，也有許多由臺灣人和日本人所寫的啟蒙文章。例如：黃紹謨〈教育論〉、林秉鈞〈教育方法論〉、劉克明〈臺灣教育之趨勢〉、陳清輝〈臺灣舊俗宜革談〉、謝雪漁〈論森林之必要〉、王思溫〈論書房教授法之利害〉等。這些文章的內容，包括科學、生物、語言學、經濟、教育等領域。無論是哪個領域，其對日治早期的臺灣人而言，都是相當高水準的知識來源。舉例來說，三屋大五郎和上野左平聯合發表的〈大瀨氏教育學要義〉，³⁹ 便有如下之內容：

體育之第二務。就在關動物的生活〈及進運動及感應〉之作用。〈一〉運動 乃於發育身體上。所不可缺。間關體育之所有目的。直接有大效能。隨而精神上加影響不少。特於共同之運動。〈即遊戲及體操等〉總使觀察敏銳。制卑劣之情。且折我意。生共同成事氣風。心身上更生顯著之效果也。然近時學校生徒。為課業之多。自為靜座之慣習。缺此貴重之運動。隨起種種之病不少。⁴⁰

〈大瀨氏教育學要義〉是連載文章，在《臺教會》雜誌總共刊登了十次。⁴¹ 不但在篇幅上有相當份量，內容方面也具有濃厚的啟蒙要素。這些近代化內容，和1920年代後臺灣人自創的一些啟蒙雜誌，幾無二致。據筆者統計，在《臺教會》雜誌漢文欄中，類似這樣性質的文章總計至少有394篇。我們若排除以刊登詩、小說為主的藝文欄，僅以論說欄及雜錄欄計算，則這近四百篇與近代化有關的啟蒙性文章，便佔了論說欄與雜錄欄的34.89%（394篇／1,129篇）。

除了一些自創文章外，從設置漢文欄開始，每一期的《臺教會》雜誌幾乎都有一、二篇文章屬於翻譯作品。根據《臺教會》雜誌漢文欄的統計，共計刊登過

³⁹ 大瀨甚太郎是日本教育家，其最早的漢文教學理論發展著作是〈教授法沿革史〉，刊於《教育世界》第25-28期，1902年。除此之外，大瀨甚太郎尚有《改訂教育學講義》、《中華教育學教科書》、《新教育學講義》、《歐米教育史》等著作。

⁴⁰ 三屋大五郎，〈大瀨氏教育學要義〉，《臺灣教育會》68（1907年11月），頁8。

⁴¹ 〈大瀨氏教育學〉的刊登情形如下：上野左平，〈大瀨氏教育學〉，《臺灣教育會》15（1903年6月），頁3-6；三屋恕，〈大瀨氏教育學要義〉，《臺灣教育會》65（1907年8月），頁5-8、66（9月），頁3-6、67（10月），頁4-8、68（11月），頁5-9、71（1908年2月），頁3-6、72（3月），頁5-7、73（4月），頁3-5、74（5月），頁3-7、76（7月），頁4-8。

7,825 篇文章，當中 193 篇作品是翻譯文章（參見附表一）。⁴² 這些翻譯文章，如川上瀧彌原〈初等農學〉（邱振成譯）、和田彰〈蒸汽機械之二大發明家〉（國猛生譯）、井上圓了〈精神修養法〉（編者譯）、和田彰〈天文講話〉（謝汝銓譯）、前川治〈論公學校體操科之價值〉（編者譯）、春原三壽吉〈臺灣醫藥材料〉（魏清德譯）等，大都具有高度的啟蒙性與近代性。⁴³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臺教會》雜誌也有許多宣揚國體或愛國思想的論文。縱使如此，這些論述也都是立足在近代化書寫基礎上完成的。更具體的說，抽離內容中的意識形態不談，這些文章大致上還是在辯證、演繹、歸納等邏輯推論軌道上所實踐的近代化論述。而不管刊登目的或近代化純度、形式為何，這些日治初期的啟蒙性文章在臺灣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眾所周知，日治時期的臺灣並非沒有以漢文來譯介日本或西洋啟蒙知識的文化活動。由臺灣文社所創設的《臺灣文藝叢刊》，便曾經在第一年第 1 號（1919），刊載由傳統文人林少英翻譯的英國 JOHN・FINNEMORE 的〈德國史略〉；「則以氏」也譯過〈夏目漱石傳〉。第二年第 4 號中，林少英又譯了英國 LUCY・CAZALET 的〈俄國史略〉，許三郎也譯了日本德富蘇峰的〈生活之意義〉……等。再者，《臺灣文藝旬報》第 14 號（1919）也曾刊載過世英的〈太歌爾氏之人生觀與世界觀〉，第 18 號則有河上肇著、楊山木所譯的〈現代經濟組織之缺陷〉等。⁴⁴ 然而《臺灣文藝叢刊》是在大正 8 年（1919）1 月 1 日創刊，比《臺教會》雜誌的漢文欄整整晚了 16 年。隨後包括《臺灣青年》、《臺灣民報》，也出現一些以平易漢文或所謂中國白話文所翻譯的文章，但這些雜誌都在大正 9 年（1920）之後才出現。與《臺教會》雜誌相比，更是慢了 20 年左右。

由這些事實來看，我們可以推測《臺教會》雜誌應該是日治時期我們目前可以清楚掌握、擁有臺灣人讀者的所有媒體中，最早利用漢文有系統且持續性翻譯日本或西方有關啟蒙知識媒體的先驅。在《臺灣文藝叢刊》、《臺灣青年》、《臺灣民報》尚未發行的明治時期，這份雜誌更幾乎是當時臺灣人唯一可以經常接觸

⁴² 其實這 193 篇翻譯文章，幾乎都是在大正 12 年（1923）年之前，在日本人擔任編輯長的時期中所刊載。翻譯文章在臺灣人擔任編輯之後大為銳減，隨後幾乎消失。筆者認為這個現象應與日文逐漸普及有關。

⁴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有部分會轉載在《臺灣日日新報》或是《臺灣時報》的漢文欄。

⁴⁴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54。

到近代文明思維的管道。

(二) 漢文欄論述場域中臺灣人的角色

《臺教會》雜誌對於臺灣人會員來說，不僅是一本能閱讀的刊物，讀者也可以扮演作者角色來投稿。以發行時間來看，同一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雖然也有漢文欄，但並沒有設置讀者投書欄，也不接受讀者的投稿。相對於此，《臺教會》雜誌漢文欄中，會員能發表作品的空間則有：「論說」、「雜報」、「學術」及「文藝」等專欄。雖然漢文欄創刊時的執筆者以日本人為主，但從明治末期（1910 年左右）開始，臺灣人執筆者快速增加；到大正時代（1912 年），臺灣人所寫的文章篇數已超過日本人。這種臺灣人執筆者超過日本人的現象，一直到昭和 2 年（1927）雜誌撤除漢文欄前都還持續存在。（參見附表二）

如果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臺教會》雜誌的編輯內容及形態，與爾後臺灣人自創的《臺灣青年》、《臺灣民報》有不少類似。具體來說，除了在政治立場上有明顯不同外，亦即一個是體制內的教育機關誌，一個是反體制的政論綜合雜誌；在內容方面，這些雜誌同樣都有許多近代啟蒙的文章，在書寫工具上都利用了雙語，也就是漢文與日文；而在編輯形態上，同樣刊登了許多包括對譯在內的翻譯文章。不僅如此，在這三本雜誌中，就連投稿者也有所重疊。

根據本文初步的調查，1920 年代後出現在臺灣的一些半日文或非日文雜誌，包括《臺灣青年》、《臺灣民報》、《三六九小報》、《南音》等，其執筆者例如：林呈祿、楊肇嘉、蔡培火、劉春木、⁴⁵ 周再賜、簡若川、黃純青、魏潤庵（魏清德）、李漢如、謝汝銓、劉克明、醒民、⁴⁶ 張淑子、⁴⁷ 呂新進、桂園居士、黃守謙、江

⁴⁵ 劉春木，1902 年 12 月 24 日生，曾任臺灣新民報新竹支局長。參見臺灣新聞社編，《臺灣實業名鑑》（臺中：臺灣新聞社，1935），頁 36。

⁴⁶ 黃周（1899-1957），號醒民，彰化和美。1918 年自國語學校師範科畢業，分發彰化公學校任教，二年後，負笈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24 年畢業，其間加入臺灣文化協會和「新民會」，《臺灣民報》創刊，任幹事。畢業後往上海、南京考察，翌年返臺擔任臺灣民報記者，1927 年任臺北總社漢文科主任。1932 年任《臺灣新民報》編輯總務，另兼論說委員、整理部長、學藝部長。參見郭啟傳、張子文撰文，《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2），頁 592-593。

⁴⁷ 張淑子（1881-1946），大雅庄人。幼讀書，日人治臺，畢業於臺北國語學校，任公學校訓導。大正 10 年（1921）加入臺灣文化協會，從事民族運動。並參加櫟社，以宣揚故國文化。後歷彰化高等女子學校教員，臺灣新聞社及臺南新聞社總編輯漢文主筆。相關資料請見張勝彥總纂，《臺中縣志》（臺中：臺中縣政府，1989），第 7 卷：人物志稿，頁 165。

肖梅、⁴⁸ 林熊徵、顏雲年、王敏川、黃旺成、⁴⁹ 黃得時、鄭坤五、⁵⁰ 瘦鶴、黃贊鈞、林振聲等等，都曾經在《臺教會》雜誌投過稿。這些人當中，除了幾個高齡的傳統文人外，大都出身自教育界。換言之，大部分都讀過國語學校。

事實上，在昭和3年（1928）帝國大學設立前，臺灣人唯一能就讀的最高教育機構幾乎就是國語學校。因此，不管是《臺灣青年》、《臺灣民報》中的殖民抵抗者，或活躍在其他領域或雜誌刊物、政治主張不同的協力者，這些臺灣人精英大都畢業於國語學校，和公學校教育也有著深淺不一的關係。⁵¹ 透過擁有龐大組織資源的臺灣教育會，並以最高教育機構這個共項為交集，《臺教會》雜誌能夠成功的吸收臺灣各路精英，並非偶然。這個雜誌也可以說是臺灣不同類型的英雄好漢在殖民地社會嶄露頭角前的梁山泊。

由於資料欠缺以及取得困難，到目前為止，除了前述人員之外，我們無法進一步取得臺灣讀者的詳細數字或正確名單。但是，如果以日治時期臺灣人曾強烈渴望的近代文明，⁵² 以及《臺教會》雜誌在日本領臺初期幾乎是唯一一本具有啟蒙性質的漢文雜誌，配合臺灣教育會曾經以積極態度爭取臺灣人教育界相關人士入會等信息來判斷，我們應該可以推測，這個雜誌的臺灣讀者應該相當多。由前述《臺教會》雜誌的發行情、漢文欄執筆者中臺灣人所占比例甚高，以及臺灣人同學會舉行通知刊登在該雜誌一事等，這個推測應該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旁證與支持。事實上在《臺灣青年》、《臺灣民報》等誕生後，一些在臺灣言論戰場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知識分子，如林呈祿、楊肇嘉、蔡培火、王敏川、黃旺成、醒

⁴⁸ 江尚文（1899-1966），號肖梅，臺灣新竹人。臺灣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曾任教於香山、新竹、新埔公學校，更曾任主任督學、日文月刊雜誌《臺灣藝術》編輯長與主筆。創作文類包括詩、散文、小說。相關資料請參見施懿琳，〈江肖梅與古典文學〉，《竹塹文獻》13（1999年11月），頁17-21。

⁴⁹ 黃旺成，或做陳旺成，筆名菊仙，新竹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1911年在新竹公學校任訓導，1918年辭教職曾經商。1925年辭商職後加入文化協會，並任臺灣民報社記者及新竹支局長。爾後成為創立臺灣民眾黨的主要人物。相關資料請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836-837。

⁵⁰ 鄭坤五，字友鶴，號虔老、駐鶴軒主人等。生於清光緒11年。書、棋、畫、藝皆有涉獵，曾任法院通譯、土地代書。著有長篇小說《活地獄》、《大陸英雄》、《愛情的犧牲》，以及歷史章回小說《鯤島逸史》等。相關資料請見林翠鳳，〈鄭坤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

⁵¹ 陳文松，〈「校友」から「台湾青年」へ：台湾總督府国語学校『校友会雑誌』に見る「青年」像〉，《年報 地域文化研究》9（2005），頁138-163。

⁵² 相關研究請參照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の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民、鄭坤五、張淑子、江肖梅等，也都或多或少與《臺教會》雜誌有所淵源。這些人在加入《臺灣青年》、《臺灣民報》之前，都曾經在《臺教會》雜誌發表過文章，甚至極有可能原本就是這本雜誌的讀者。（參見附表三）

以這個角度來觀察，《臺教會》雜誌的漢文欄除了是臺灣人吸取近代啟蒙知識的管道外，還具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便是實際上也扮演了培養本土近代媒體的角色。透過《臺教會》雜誌，臺灣人一方面以閱讀的方式吸收雜誌中的養分，體嘗到作為近代讀者的滋味和經驗；另一方面也親手提筆，以書寫投稿方式，投身近代化論述的場域。以歷時性的角度來看，臺灣人在經營自己的媒體之前，其實已經利用《臺教會》雜誌進行過相當程度的觀摩操練或預習。在經過演化移轉後，這些成果便成為1920年代以降《臺灣青年》、《臺灣民報》等雜誌出現的基礎條件。

在此我們好奇的是：近代媒體的誕生，除了必須有近代化的編輯內容、讀者、作者外，其啟蒙、合理、科學、多元的論述本身，也需要一個近代化的語言文體做為傳遞基礎。這個近代化的語言文體，並非先天必然的存在，而是必須經過一番複雜、長期的演化過程，才得以淬鍊而成。⁵³ 以日本為例，明治維新時日本知識分子曾花費無數時間，透過大量翻譯西方著作，繼而在啟蒙運動中大量摹寫後，才得以讓江戶末期那個原本破舊不堪，只能承載儒教封建式、前近代事象思維或觀念的漢文，逐漸脫胎換骨，成為可以表達近代法律、進化論、西方哲理思想的現代日文。⁵⁴ 從日本的例子來看，甲午戰爭後的臺灣，一些清朝遺留的語文資源，包括文體、語彙等形同江戶末期的日本漢文般，應該只能承載封建儒教式的前近代事象、思維或觀念，而不具備做為近代媒體或啟蒙性論述的基礎。在這

⁵³ 有關這個方面請參考：陳培豐，〈識字·閱讀·創作和認同：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3（2007年4月），頁83-111；陳培豐，〈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收於陳芳明主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190-237。

⁵⁴ 日本的國語國字運動是在慶應2年（1866），由建立日本近代郵務制度的前島密（1835-1919）燃起戰火。而就像前島密在許多文獻中經常提起「國家的大本在於教育」這句話般，國語國字論戰最初是為了教育的普及改革；其本意是希望借由文字表記的簡易化、合理化，來解放一般民眾的知識教化權利。換言之，是為了克服漢文做為近代化傳遞工具的拙劣性。參見平井昌夫，〈第四章：明治維新と國語國字問題〉，《國語國字問題の歴史》（東京：昭森社，1948），頁155-200。

種情形下，臺灣的知識分子又是如何由前近代式的言論社會，「突然」跳躍到近代化論述的世界？

換言之，在甲午戰爭結束後不到十年中，一部分臺灣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利用漢文為媒介，快速成為近代媒體刊物中一個既可閱讀、也能書寫的讀者或執筆者，其基礎到底在哪裏？而這些基礎的形成，與《臺教會》雜誌或《臺灣青年》、《臺灣民報》又有什麼關連？在思索這個問題時，《臺教會》雜誌漢文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五、「殖民地漢文」之誕生與其意義

（一）時光倒流的仲介性文體：「殖民地漢文」

《臺教會》雜誌的漢文之所以能快速被臺灣人接受，主要原因即在於文體的特殊。在此，不厭其煩地再舉三個文例來說明：

夫社會有變動。則破其階級秩序。而道德制裁自弛。為不良之行者相踵出」此乃社會一大變矣。我國從來所定士農工商之等級。及門閥舊習。進行壞破。四民為平等。加之以所誤解自由說為兵器。曰彼舊弊矣。曰此舊習矣。社會一切壞破去。（〈吾之杞憂乎〉國語學校長 田中敬一君演說 國語部三年生 林振聲等譯錄・1905年3月36號）

体操有兩種一曰普通体操。一曰特種体操。約普通体操者。乃欲使身体壯健。普通一切之体操是也。（〈体操源委〉謝汝銓 1904年12月33號）
牧草雜草之類，雖非犁起土地而植之，亦能生育……凡植物乃要空氣及水，土地膨軟，則根喜伸長，蔓延土中，自攝取其必要之養分，此養分稱曰植物營養分。（第壹課 整地〔俗語創田〕〈初等農業〉川上瀧彌原 撰 邱振成 譯 1905年3月36號）。⁵⁵

對於做為讀者的我們來說，以上三個例文，或再加上前面所舉〈大瀨氏教育學要義〉共四篇文章，全都以漢字漢語羅列而成，並沒有太大的特色。但是對於

⁵⁵ 東門小史，〈教育之三勢力〉，《臺灣教育會》11（1903年2月），頁9。

一世紀前的臺灣人而言，這些例文中的文體，卻是相當特異的存在。因為「體育」、「運動」、「感應」、「目的」、「體操」、「觀察」、「學校」、「生徒」、「社會」、「階級」、「秩序」、「慣習」、「營養分」等，這些現今我們耳熟能詳的詞彙，都是隨著日本統治才進入臺灣社會的和製漢語；「壞破去」、「壯健」、「創田」、「犁起土地」、「膨軟」等則應該屬於臺語。以文法或習慣來看，「隨而精神上加影響不少」、「為課業之多」、「缺此貴重之運動」、「我國從來所定士農工商之等級」、「加之以所誤解自由說為兵器」、「普通一切之体操是也」等，則具有和式漢文的色彩。

換言之，前述這些文章在語彙構成上融合了中國、日本及臺灣的要素，是駁雜性與新穎性都很高的文體。相對於《臺灣新報》或早期《臺灣日日新報》所出現的古典漢文，這些文例都兼具有通俗漢文的色彩，相當接近〈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等清代便流通於臺灣的白話小說文體。

《臺教會》雜誌漢文欄中的文體，介於文語體與口語體間，也就是具有新舊交陳、文白相雜的特色。有時候雖也使用之、乎、者、也，卻有清楚的標點與斷句。在功能性方面，這些文體和當時臺灣白話小說最大的差異，應該在於：《臺教會》雜誌的漢文雖也有口語色彩，但其所描寫的不是封建、前近代的儒教世界，而大都是一些啟蒙性、近代性及時事性的內容。

總的來說，這個文體是由古典漢文、通俗漢文、和式漢文、和製漢語四種不同形式的漢字漢文共構而成。古典漢文、通俗漢文，提供這個文體的在地性和普遍性，而和式漢文與和製漢語則主要是做為近代性、啟蒙性以及一些新而抽象的概念之載體。在不同形式的漢字漢文各自分工下，在帝國海外領土的臺灣，這個綜合性文體就如同流通於日本內地的「帝國漢文」訓讀體一樣，也具有「一種萬人皆宜」、「並不具有地方或歷史特色」，中性的、仲介性的文體。《臺教會》雜誌之所以設置漢文欄，其原因便是為了在日語尚未普及前，有效而快速的吸引、教化一些臺灣受過傳統漢文教育的相關從事者，繼而打造出他們和統治者之間接融和溝通的平臺。在這個任務前提下，《臺教會》雜誌漢文欄的文體，便必須肩負著跨連民族、階級、世代、身分的任務，而成為讓日本人、臺灣新世代知識分子及傳統文人都能共享的中性媒介。《臺教會》雜誌漢文欄文體的駁雜性所反映出來的是，領臺初期日本帝國在殖民地的階段性統治策略。或者說，其本身就是這

個策略實踐後的成果。

又由於這個從《臺教會》雜誌衍生而來的漢文文體具備著高度的駁雜性、接融性與仲介性，因此除了《臺教會》雜誌的臺、日相關人員外，這個文體也迅速的流通在其他領域的臺灣傳統文人中。

「晴天，往墩，到役場領觀日露戰爭活動寫真入場券百二十枚，又小兒券二十枚；又領黃麻子官斗壺斗六升八合。適清波往云：中營佃人陳維持數簿來家，欲會對磧地差錯事、予遂回與他會對」「厥後予轉一路云，汝兄弟分居，已將此六十元之額分汝，今欲苟完，汝兄三幫出六元，餘十元則予與汝對開。」⁵⁶

以上，是日治時期臺灣人保甲張麗俊於明治 39 年（1906）2 月 24 日記載的日記片段。在這段日記中，摻雜著臺式漢語如「會對」、「汝」、「對開」、「磧地」，更使用了「役場」、「活動寫真」、「入場券」等和製漢語；日記中的「地文」，也是通俗漢文。而這種以高度混雜方式組成的文章，也同時可見於黃旺成日記。⁵⁷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相對於黃旺成等畢業於國語學校的新知識分子，張麗俊卻是只受過書房教育、連公學校都沒上過的傳統文人。甲午戰爭結束後約十年，出身於不同教育體系的臺灣人開始使用一個類同的文體，這個現象顯示出這個文體的滲透力之強勁和普及層面之寬廣。而這個拼湊式漢文，在當時之所以能成為「萬人皆宜」的文體，其理由乃是因為：針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包括受過不同教育者），這個文體具有仲介各種不同階級間的溝通作用。因此，以政治立場看來，《臺教會》雜誌漢文欄的投稿者不但有許多日本人，也有魏清德、謝汝銓、劉克明、林熊徵、顏雲年等比較具協力色彩的臺灣人，甚至包括了林呈祿、楊肇嘉、蔡培火、醒民、王敏川、黃旺成等一些爾後加入反體制運動的臺灣人。不僅如此，以臺灣的語文改革主張角度來觀察，這些投稿者有古典漢文派的李漢如、謝汝銓、黃贊鈞、簡若川；中國白話文派的醒民、林呈祿、楊肇嘉、王敏川、黃旺成；臺灣話文派的劉克明、鄭坤五、張淑子、黃純青；臺灣羅馬字派的蔡培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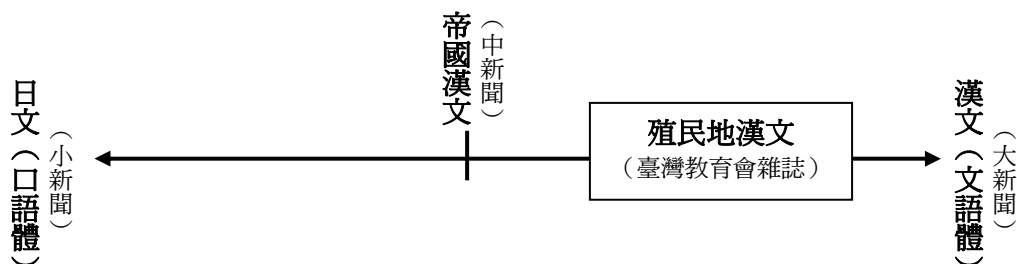
⁵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20。

⁵⁷ 許雪姬編，《黃旺城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第 1-2 冊。

以及日文派的江肖梅等。這些人在 1920 年代以後，雖然提出各種不同的語文改革主張，但在此之前，卻又都以《臺教會》雜誌為共同場域，使用類似的文體，發表過自己的作品。

從溯源的意義來看，《臺教會》雜誌中的文體，可說是1920年代後臺灣各種語文改革主張的土壤或出發點；各種文體，都可在此找到一些交集。換言之，也是日治時期臺灣許多文體的雛型與交集之處。

然而，日本在領有臺灣之前，漢文已逐漸在其內地的媒體市場中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前面所說的「帝國漢文」這個訓讀體；因此除了一些特定媒體外，當時日本的媒體主流如《國民之友》、《太陽》等，早早就放棄了漢文。⁵⁸ 更具體的說，《臺教會》雜誌的漢文，其實只流通在1900年代日本帝國海外殖民地的臺灣，與日本內地並沒有共時性，更並非「萬人皆宜」。因此，《臺教會》雜誌的漢文雖是統治者與被統治共有的文體，對日本帝國而言，卻是歷史上的過去；其在臺灣的復出，代表的是東亞殖民特殊文化情境下一種文體回歸的現象。



圖一 「帝國漢文」與「殖民地漢文」之示意圖

基於這些理由，針對這個為因應殖民統治之需，由統治者主動發起，統治者、被統治者，即包括新舊文人、不同政治立場的臺灣人所共有；功能上承載近代啟蒙以及皇民意識形態；流通空間上以臺灣為範圍，形態上以古挾今，由古典漢文、通俗漢文或和式漢文摻雜近代化語彙，而形成的具有中性或仲介色彩文體，筆者稱為「殖民地漢文」。⁵⁹ 《臺教會》雜誌漢文欄中的許多文章，便是以這個「殖

⁵⁸ 當時日本的媒體主流如《國民之友》、《太陽》雜誌中，通常只有設置漢詩欄而沒有漢文欄。

⁵⁹ 若與《臺灣日日新報》加以比較，《臺教會雜誌》中的漢文欄，大多偏向申論以具有理論性質的「論說文」居多。《臺灣日日新報》則以輕薄短小的新聞體敘事文居多，加以強烈的時事寫實色彩。

民地漢文」所書寫而成。

(二)做為「殖民地漢文」配備裝置的「國語」教育

「殖民地漢文」是《臺教會》雜誌漢文欄的主要文體，但是這些以新舊交混方式拼湊而成的文體，對於臺灣讀者而言，理應是新奇陌生且充滿理解障礙的文體。這些障礙之所以能夠迅速地迎刃而解，則受到了「國語」教育相當大的幫助。

近代知識的攝取，依賴識字與讀書。而讀書行為的成立，也就是讀者是否可進入閱讀文本中的脈絡，則通常是依賴以下三個條件：(1)語字，或更精確的來說，是語言記號的可辨性。(2)各類文本中，這些詞彙出現的頻繁度。(3)讀者對於這個詞彙的熟練度。⁶⁰「殖民地漢文」雖是殖民地的新文體，但《臺教會》雜誌漢文欄中大部分的語字，特別是古典漢文或通俗漢文的可辨性或熟練度，對於原本便擁有漢文基礎的臺灣人而言，應該不難克服。因為領臺初期，包括魏清德、劉克明、林熊徵、林呈祿、楊肇嘉、蔡培火、黃旺成、鄭坤五、王敏川、張淑子、黃得時、江肖梅等臺灣人，雖然就讀的是公學校，但同時也學習過傳統漢詩文，因此對各類文本中詞彙的熟練度可說是駕輕就熟。

當然，語文以及其所形構的文體，是人類社會不斷變更或經常創新，進而形構出來的一種約定俗成。⁶¹這個約定俗成，需要許多文化、知識、歷史等配備裝置做為支柱，才能成立。換言之，文體是反映人類歷史、文化、思想變遷的一面鏡子。對於臺灣人而言，縱使有古典漢文或通俗漢文做為接融「殖民地漢文」的道具，但如果沒有相關知識做為裝置配備，要將這個行之百年以上的書寫閱讀習慣，轉換成含有和式漢文要素的「殖民地漢文」，絕非容易之事。

自古以來，漢文在書寫上原本便有許多押韻、對句、引經據典等文體上的約制。這些約制與規範，雖被認為是漢字漢文近代化之障礙，但卻同時發揮了將知識、經驗或概念秩序化、構造化、定型化的作用。⁶²更具體的說，漢字漢文本身便是高度建立在中國文化、知識、歷史等配備裝置上的一種表記體系，不但是書寫方式，也是一種充滿思想、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概念體系。在這個前提下，

⁶⁰ ロベール・エスカルピ著、末松寿譯，《文字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東京：白水社，1988），頁50。

⁶¹ ロベール・エスカルピ著、末松寿譯，《文字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頁6。

⁶² 加藤周一、一海知義，《漢字・漢語・漢詩：雑談・対談・歓談》（京都：かもがわ出版，2005），頁29。

十九世紀前流通在日本的漢文，不但在文體上與古典漢文擁有親緣性，兩者之間在文化、思想、知識的表達習慣上，也有高度的類同機制。這個機制，一方面讓漢字漢文成為理解自古以來東亞知識體系的主要管道；另一方面，也是《臺教會》雜誌創立後，日本人和臺灣人得以迅速共有「殖民地漢文」的基礎所在。

當然，近代化文章的形構必須使用近代化的新詞彙。以前述〈大瀨氏教育學要義〉為例，在短短的幾行例文中，便摻雜了如體育、運動、感應等近代化用語，讀者若不能理解這些新詞彙的意涵，便無法讀取文中的意義。而〈大瀨氏教育學要義〉的詞彙結構暗示我們，「殖民地漢文」主要是以龐大的近代化相關詞彙做為「語庫」，沒有這些詞彙，「殖民地漢文」是無法成立的。日本在明治維新時，雖然大量創造了一些與近代化相關的新詞彙，但這些詞彙幾乎都是以漢語形態創造出來，因此對於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而言，這些和製漢語的新詞彙無疑是一個現成的「殖民地漢文」語庫。《臺教會》雜誌的臺灣人執筆者或閱讀者，原本便是以受過公學校教育洗禮的新世代知識分子為主，而這些新詞彙實際上又是日文的一部分，是可以在學校中習得的「國語」。因此，縱使這些近代化相關詞彙運用在「殖民地漢文」時，缺乏發音上的規範，但憑藉漢字這個表意文字的視覺辨識，臺灣人在學習這些新詞彙時，依然可以把它儲蓄到「殖民地漢文」的語庫來加以使用。

這也就是臺灣人在沒有教育機制做為奧援，或辭典做為規範的艱難條件下，在針對「殖民地漢文」進行內容讀解或語意攝取時，憑藉表意文字在視覺辨識上的便利性，依然可以快速形成精確穿透力的主要原因。更具體的說，以東亞的「同文」關係做為基礎，臺灣人由古典漢文越渡到「殖民地漢文」的過程，所意味的並不是書寫表記體系或詞彙辨知關係的徹底更換或重建，而是兩種新舊文體之間，表達習慣應用或套用的細部調適。也由於這些細部調適，不管是對於和製漢語新詞彙的學習、和式漢文熟悉度的擁有，以及對於近代知識或日本文化歷史的理解等等，在公學校中都已大致配置完成。因此，對新一代的臺灣知識分子來說，兩種文體的切換並非難事。公學校或國語學校，事實上便是生產「殖民地漢文」理解者的配備工廠。

就像明治時期日本的大、小、中新聞，分別形成了文語體、口語體、帝國漢文訓讀體一般，一個文體的產生，基本上是媒體、執筆者、讀者共構的結果。也因此，如果以公學校或國語學校是生產「殖民地漢文」理解者配備工廠的角度來思考，我們或許可以對於：「殖民地漢文」沒有大量出現在以日本人為主要讀者的《臺灣新報》或《臺灣日日新報》，而是在有許多臺灣新世代知識分子讀者的《臺教會》雜誌中萌芽和成長中，尋找到一個解釋。這個解釋便是：摻雜臺灣、日本、中國要素的「殖民地漢文」能否誕生的關鍵，是在媒體的讀者群中，和「國語」教育有淵源的臺灣人人數比例的多寡。以這個觀點來看，便可以發現《臺教會》雜誌具備了《臺灣新報》或《臺灣日日新報》所沒有的條件。

《臺教會》雜誌、臺灣人與「殖民地漢文」之間，因此存在著互為因果的辯證關係，以及文字共構的歷史條件。在利用漢字漢文的特質以及「國語」教育做為接融工具的情況下，讓日治初期的「殖民地漢文」克服了古典漢文、通俗漢文、日文、臺語等「多層語文構造」的障礙，在臺灣社會中迅速跨出了近代化文體難關的第一步。

六、藉由翻譯「帝國漢文」而殊途同歸的兩個文體： 「殖民地漢文」與中國白話文

（一）演繹後依然與中國有臍帶關係的「殖民地漢文」

《臺教會》雜誌漢文欄在創設之初，不只刊載翻譯作品，也刊登為數頗多的漢、日文對譯文章（參見附表四）。這些文章的對譯作業，更是發揮了演繹或穩定文體的作用，提昇「殖民地漢文」做為一個近代文明載體的功能，使其能夠穩固的流傳和推廣。

我們如果注意觀察，便會發現除了前述《初等農業》中的〈整地〉（川上瀧彌原撰，邱振成譯）等翻譯文章之外，《臺教會》雜誌中仍有不少如〈法制經濟大意〉（添田壽一著、南巢生譯、二冊下 21 號）、〈蒸汽機械之三大發明家〉（和田彰著、國猛生譯、七冊下 78 號）、〈舊思想之桎梏須脫去之〉（山口善

一郎著、國猛生譯、八冊上 83 號) 等的啟蒙文章，都是以同時在日文欄與漢文欄對譯的方式被刊載出來。據統計，在明治 36 年 (1903) 至大正元年 (1912) 期間，這種以對譯方式刊登的文章，至少有 41 篇。

前面業已說過，不同於《臺灣新報》或《臺灣日日新報》日文欄與漢文欄幾乎互不相干的相互平行狀態，⁶³ 《臺教會》雜誌的漢文欄經常採取對譯的編輯方式。⁶⁴ 由於這些翻譯成漢文的文章，通常是該期雜誌中篇幅最長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因此許多對譯文章如前述的〈大瀨氏教育學要義〉，甚至是以連載的方式出現。筆者認為：這種對譯的編輯形態，對於「殖民地漢文」文體的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根據柳父章和酒井直樹的翻譯理論，一個近代文體的確立，經常是透過長期且不斷的翻譯作業，才能演化而成。因為，翻譯不只是一種單純的意義置換工作，也是一種語文載體重新整構或建立的作業。⁶⁵ 更具體的說，翻譯並不僅是一種追求意義之間等價關係的交涉作業，翻譯者在從事翻譯工作時，經常必須被迫去克服一些翻譯者自己的語文系統中，明知不可譯而強行翻譯下，所萌生出來的文法矛盾與縫隙；同時，也被迫必須去進行一些彌補語意流失、分裂或不自然的作業。在如此的情境底下，譯者在進行翻譯作業的同時，其實也針對自己所面臨到的一些新的、未經驗的世界和境地要如何表達之課題進行規範化、秩序化及制度化，以便建構一套約定俗成的默契和共識。

在上述作業的進行過程中，譯方本身的語文系統勢必受到相當程度地衝擊，其萌生大量新語彙，甚至打破原有文法規範，繼而創造出新文體。⁶⁶ 但是透過大量且長期的閱讀與摹寫，這些翻譯文體反而會慢慢滲透到閱讀者心中，成為一種經驗或變成一種公認的行文風格，甚至是多數人的書寫習慣。換言之，這個新的

⁶³ 臺灣日日新報也有「對譯」狀況，但不一定是當天對譯，有可能隔一天。某些新聞版面必須大量依賴內地「電報」或新聞報導，再以漢文翻譯。同樣的島內新聞，也多有日漢對照情形。參見李承機，〈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頁 201-239。

⁶⁴ 《臺教會》雜誌與領臺初期臺灣第一本國語教材，也就是採取對譯教學法的國語傳習所的《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之課文的編輯方式有些類似。雖然不同於《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的課本，是以課文上方是日文、下方則是臺灣話的方式逐一對譯；但是在同一期雜誌中，經常會在日文欄和漢文欄刊載同一篇文章。

⁶⁵ 西谷修，〈《國民》の「翻訳」〉，《國文學》43: 10 (1998 年 9 月)，頁 50-53。

⁶⁶ 柳父章，《翻訳語の論理：言語にみる日本文化の構造》（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0），頁 334。

自家語文系統，在歷經適應和熟悉後，便成為一種眾人可以接受、且足以對應近代化的語文載體。

以日本為例，十六世紀也就是近世之後，日文中的訓讀體之所以異常發達，便是大量翻譯自中國傳來的禪宗、佛經所造成的結果。日文中的訓讀體，是翻譯古代中國文明時所產生的一種「中文日化」文體變遷現象，也是訓讀漢文之所以被認為就是「把漢文按照日文（古文）文法來翻譯」的理由。⁶⁷ 然而，在江戶時代原本可以承載儒教世界勸善懲惡價值觀的和式漢文，在明治維新後卻蛻變成一個足以傳達盧梭、黑格爾、達爾文等進步思想，或類似莎士比亞、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心靈境界的載體。其重要的關鍵即在於：日本的知識分子曾大量翻譯西洋的書籍。不僅如此，在這些翻譯成果問世之後，還不斷地與這些作品進行對話，即摹寫、仿作或批判、讚美、評論。換言之，就是因為歷經這個文體演繹、淬鍊的過程，「帝國漢文」才得以變成一個可以描述近代化生活中，人類複雜纖細的內心精神、思考、際遇、情境、主張的近代化語文體系，而一個近代化的日文也才得以誕生。

翻譯使文體產生變化。透過不斷的翻譯以及翻譯文章的閱讀與摹寫，一個新文體才能有穩固的基礎。當然，《臺教會》雜誌在翻譯一些啟蒙色彩濃厚的文章同時，也促使臺灣的漢文逐漸往「殖民地漢文」移動。而臺灣的知識分子在面對這種文體漂移的現象時，是不可能沒有知覺的。

在《臺教會》雜誌漢文欄發行約十年後的明治末期，經常在這個雜誌發表漢詩的臺灣傳統文人胡南溟，⁶⁸ 便曾經以「為了體現文明國民本色，跨越臺日間的障礙，加入歐美世界」為由，建議將流通於當時臺灣文化界的漢詩文文體，改稱為「明治體」。雖然胡南溟提出的構想，主要是針對「詩話」，也就是詩評，且其所提出來的「明治體」，定義也不甚明確，但其提出這個主張的動機和理由，卻非常清楚。胡南溟認為：臺灣在日本統治下已開始邁入了文明開化期。此際，臺灣文人為了要論述一些與近代文明相關的事項或議題，書寫的文章或漢詩文體已

⁶⁷ 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體成立事情》（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4），頁29-40。

⁶⁸ 胡南溟（1906-1951），臺南人。光緒17年（1891）與許南英、蔡國琳等組「浪吟社」。明治31年（1898）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明治35年（1902）任《臺南新報》記者，明治38年（1905）任《福建日日新聞》編輯。明治39年（1906）南社創立，為該社重要社員。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施懿琳撰，〈胡殿鵬〉，頁610。

產生變異，和以往的漢文有明顯的不同。為此，胡南溟強調在新的政權下，應該給這個新文體一個符合時局的適當稱謂，並繼續予以提倡。⁶⁹

胡南溟的主張雖然最後並沒有實現，但「明治體」的構想卻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就是：1910年代流通於臺灣的文體已產生變化。這個變化，大到連一般被認為對近代化較不關心的傳統文人都開始有了自覺。從胡南溟提出這個構想的動機與背景來看，其所謂的「明治體」應該就是所謂的「殖民地漢文」。

不管是「明治體」或「殖民地漢文」，在日本異民族統治下這個新文體的誕生，也意味了流通於臺灣社會的文體開始脫離了清朝的掌控，而以不同於中國的步伐走上自己的路途。換一個角度來說，胡南溟之所以會為新文體冠上「明治」兩個字，已顯示這個文體具有「脫清入日」的傾向，是一個以臺灣與日本作為新養分所形成的文體；而在其萌芽與成長的過程中，中國基本上是不在場的。由於中國在這場「殖民地漢文」演化過程中的缺席，甲午戰爭後臺灣與中國將可能從「同文」或「共文」的文化情境開始各奔前程。更具體的說，「殖民地漢文」的形成，背後便隱含了臺灣、中國兩地文體在發展上將出現明顯歧異或斷絕的可能。

然而，歷史的演變往往是複雜而曲折的。事實上，明治末期「殖民地漢文」的出現，並沒有切斷臺灣與中國在文體上互通的臍帶。這從「明治體」構想出現的同時，梁啟超來臺訪問時所引發的種種現象，可以看出端倪。

明治44年（1911年）梁啟超訪問臺灣。在為期十幾天的訪臺期間，廣東出身只會廣東話的梁啟超，與許多臺灣知識分子進行過會談。這些會談中，有許多議題或內容與近代化或抗日策略相關。而從這些交談與溝通使用筆談便暢行無礙一事來看，我們可以間接得知：即使因為「殖民地漢文」的出現而使臺灣文化界的文體有了變化，但臺、中之間「同文」或「共文」的文化情境卻沒有因此而被摧毀，兩者之間依然存有相當程度的類似性與互通性。這種現象背後所存在的原因無它，讓兩地文體強韌連繫在一起的便是梁啟超自己與「帝國漢文」所形成的關鍵影響。

⁶⁹ 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發表於國家臺灣文學館主辦，「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年10月15-16日），頁1-36。

(二)梁啟超的「新民體」與「帝國漢文」

一提到近代中國的外國書籍翻譯，許多人立刻會想到嚴復與梁啟超這兩位近代啟蒙家。⁷⁰ 雖然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胡適居功厥偉，但是如果沒有梁啟超或嚴復在五四運動之前便開始從事近代化書籍的翻譯，同時在《清議報》、《新小說》等雜誌中刊登或進行摹寫仿作、演練這種翻譯文體的話，胡適的中國白話文運動是不可能水到渠成的。⁷¹

清光緒 24 年 9 月（1898），梁啟超亡命日本。光緒 27 年（1901），當時 26 歲的梁啟超便立刻創設了《清議報》。隔年（1902）11 月，又成立了《新小說》。《新小說》的內容，主要是以新舊折衷式文體連載的章回小說。換言之，這些章回小說所刊載的題材是新的，但是文體則與「殖民地漢文」一樣新舊交陳、文白相雜。⁷² 梁啟超在自己所主編的雜誌中，也以所謂的「新民體」發表了大量翻譯自當時日本的文章。這些以「新民體」書寫的文章，則在明治 35 年（1902）左右經常被《臺灣日日新報》轉載。⁷³

根據齋藤希史與清水賢一郎等人的研究，身為中國的啟蒙思想家以及譯介近代化思想的翻譯者，不具日本留學經驗的梁啟超之所以能迅速大量翻譯日本的書籍文章，主要憑靠的還是「同文」的文化背景。如前所言，明治維新時日本知識分子大量翻譯了西洋的著作，但由於當時日本人並沒有使用口語體，而是以漢文成分很高的訓讀體做為譯介載體。因此，雖然不曾正式留過學，日文造詣也不高，梁啟超卻以自習的方式鑽研了日文翻譯的要訣，並且利用客居日本的期間，以漢

⁷⁰ 波多野鹿之助，《中国と日本における近代文学》（東京：白楊社，1953），頁 2-3。

⁷¹ L・Hリュウ著、宮川康子譯，〈語言横断の實踐・序説（上）〉，《思想》第 899 號（東京：岩波書店，1995 年 5 月），頁 21-44。

⁷² 梁啟超在日本受到《國民之友》這本雜誌的影響。其《新小說》的發行趣旨幾乎和《國民之友》一樣。梁啟超在日本期間，正值「小說待望論」盛行。以《帝國文学》、《太陽》、《國民之友》為舞台的大量議論、作品出現。當時雖然日本的政治小說風潮已過，但是在中國這個風潮卻依然具有意義。

⁷³ 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從明治 35 年（1902）7 月 3 日到明治 36 年（1903）2 月 18 日刊行於《臺灣日日新報》，共 24 篇。轉錄自新民叢報如〈無煙政府〉（1902.4.18）、〈地底鐵路〉（1902.4.19）、〈天下有四種人〉（1902.7.16）、〈史界免塵錄〉（1902.11.26）、〈海外雜俎〉（1903.2.14）、〈聶將軍歌路〉（1903.3.12）……等。而明治 38 年（1905）到明治 44 年（1911）《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另刊有四篇提到《飲冰室詩話》。

文訓讀體這一與古典漢文有濃厚親緣性的文體做為橋樑，快速而有效的把日本近代化知識引介到中國。換言之，當時梁啟超在日本所接觸或大量翻譯的，其實便是一些以「帝國漢文」所書寫的作品。

有關梁啟超與「帝國漢文」的關係，由於清水賢一郎與齋藤希史已有詳細的研究，在此不再贅言。⁷⁴ 但本文在此要強調的是：「新民體」這個被認為是中國白話文前身的文體，和「殖民地漢文」之間不但擁有同源關係；其創造者梁啟超翻譯「帝國漢文」的手法，甚至也與《臺教會》雜誌對「帝國漢文」的處理類似。

從文體的結構來說，梁啟超的文體和「殖民地漢文」一樣，都是由古典漢文、通俗漢文、和式漢文、和製漢語四種不同形式的漢字漢文共構而成。以近代東亞地區的漢文脈來看，「新民體」與「殖民地漢文」之所以沒有受到太大阻撓，而被各自的讀者接受的理由也相當類似。因為對於中國的民眾而言，「新民體」中的古典漢文、通俗漢文原本便具有在地性、普遍性以及相當程度的熟悉度。和式漢文的部分，也因其本身便是一種高度建立在中國文化、知識、歷史等配備裝置上的表記方式，而成為接融時的捷徑。因此，梁啟超在進行翻譯活動時必須面對的主要課題，便是如何去處理和製漢語的引介與翻譯。

前面業已說過，明治維新時為了因應近代化的事象、概念、思想，日本創造了大量的近代化語彙。由於這些新詞彙都是以漢字來創造，因此梁啟超在面對這些和製漢語時，其態度和臺灣人在面對「殖民地漢文」時如出一轍，同樣都是透過表意文字的視覺辨知，以幾近照單全收的方式將這些新詞彙吸取、分株，蓄儲到中國白話文的語庫中加以使用。梁啟超相對於嚴復以自創新詞或取自中國古代用法的方式，則在翻譯西洋的新詞彙時，幾乎直接挪用了這些和製漢語。嚴、梁兩人不同的方法與態度，也因而產生了許多同義不同詞的詞彙歧異現象；如生學（生物學）、質學（化學）、計學（經濟學）、群學（社會學）、智環（百科全書）。不過在經過民眾的一番淘汰後，存留在中國的新詞彙，卻是前述詞例中加括弧的詞彙，即大都是梁啟超由日本借來的和製漢語。⁷⁵

⁷⁴ 有關這方面，請參考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清水賢一郎，〈梁啟超と「帝国漢文」〉，頁22-37。

⁷⁵ L・Hリュウ著、宮川康子譯，〈語言横断的實踐・序説（下）〉，《思想》第900號（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6月），頁107-115；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2008年12月），頁1-42。

譚汝謙在統計了清末到民國初期的出版物之後，提出了「在明治維新後中國借用日本新造語數量高達1,063語之多」的結論。⁷⁶ 這些語彙大部分都與近代化有關，也因此多以名詞為主。雖然如此，在中文或日文當中，名詞經常是可以直接變換成動詞來使用。因此，在這個語法結構的前提下，和製漢語對於中國白話文的影響，也就遠遠超越了名詞的數量及其所蘊含的意義和範疇。⁷⁷ 和製漢語的引借，使得新民體、中國白話文及「帝國漢文」之間的類似性更加緊密。這種直接引借和製漢語的翻譯方式，其實與臺灣的「殖民地漢文」同出一轍。

中國的近代化運動之所以成功，梁啟超的翻譯貢獻不容小覷。沒有梁啟超這些翻譯及其翻譯過程中所鋪陳的文體演繹基礎，五四的白話文和新文學運動不可能順利走上成功之路。從某一個程度來說，中國白話文的形成，不但和「帝國漢文」脫不了關係，與爾後在臺灣出現的「殖民地漢文」，不管是在「同文」的文化基礎上，或取材來源上、形塑原理及模式方法上，幾乎如出一轍。換言之，甲午戰爭後臺灣和中國雖然身處不同的時空環境，政治境遇也各自不同，與日本帝國的接觸方式、規模與時間也有落差，但雙方卻一前一後、不約而同地在自己居住的領域中，利用「帝國漢文」為養分形構出屬於自己的文體。

進言之，二十世紀初流通於臺灣與中國的文體，其取徑方式、時期雖然不同，但其培養土壤、條件或方式卻相當類似。也由於「帝國漢文」在這中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梁啟超曾明確的主張：為了吸取西洋學術精華，中國人必須認真學習的語言，與其說是英語，不如說是鄰國具有文化親緣性的日語。⁷⁸ 為此，梁啟超還曾特地編纂了一本《和文漢讀法》，以便讓更多沒有機會學習日文的中國人能夠快速讀解日文。⁷⁹ 對於中國人而言，留學日本或閱讀《和文漢讀法》是接

⁷⁶ L・Hリユウ著、宮川康子譯，〈語言横断の實踐・序説（上）〉，頁37。

⁷⁷ 針對構成現代中文的主要語彙之變化，據中國學者高明凱、劉正炎的研究指出：現代中文有1,226個主要語彙是新造語，其中有495個語彙借用自明治維新時，日本語漢譯自歐美的和製漢語。針對類似問題，王立達認為借用語的單語數量是588個，但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的調查則舉出了830個。

⁷⁸ 梁啟超認為：「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余之所言者，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日本文漢字居十之八九，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為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然而熟記之，則以可讀書然而無窒矣。」見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轉引自齊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頁114。

⁷⁹ 《和文漢讀法》全部共42節，是一本相當便利實用的書。書中第38節，更附了和製漢語的一覽表，其中將學術用語、日常用語整理附上。和製漢語的一覽表除了政治、哲學之外，也包含了許多文學翻譯書中的用語。

融日文的一種基礎整備；但是對於許多臺灣人而言，這些基礎裝置的整備，則可以透過「國語」教育來進行。

明治 44 年（1911）梁啟超在訪問臺灣時，曾贈送《和文漢讀法》給沒有正式受過「國語」教育但卻會一些日文的林獻堂，並建議他以這本書做為攝取西洋近代文明的管道。⁸⁰ 梁啟超訪臺時的這個插曲，告訴我們翻譯「帝國漢文」這一課題在東亞漢文脈中的重要性和曲折性。除此之外，也凸顯了歷史的諷刺，即在日本這個新興帝國外緣的中國與做為殖民地的臺灣，其攝取近代化知識的途徑與文體之間的形構，其實是一種殊途同歸的關係。

當然，以《臺教會》雜誌為主的對譯、翻譯或摹寫的經驗規模，和梁啟超翻譯日文的情形不盡相同。但是在為期 27 年的漢文欄發行期間，《臺教會》雜誌所累積下來的對譯、翻譯或摹寫經驗，在臺灣的知識界或媒體界投下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以歷史發展結果來看，這兩個異曲同工的翻譯活動，前者萌生出「殖民地漢文」，並進而演化成 1920 年代《臺灣青年》或《臺灣》中所謂的平易漢文；後者則形構了「新民體」，並蛻變成中國的白話文。

「殖民地漢文」與中國白話文在演化過程中，存有同源性與類似性。這種關係，讓 1920 年代後期臺灣的語文改革運動和對岸的中國白話文運動有了一拍即合的基礎，也促使臺灣人萌生出一種語文共同體的想像。1911 年梁啟超的訪臺、之後其著作在臺灣文化界的風行，就像是一顆投入臺灣人心池中的石頭，讓這個語文共同體想像有如水波紋般，快速在臺灣社會擴散。

七、文體共同體想像的形成與分裂

（一）媒體、啟蒙及時髦所引發的文體共同體想像

明治末期，梁啟超的訪臺在臺灣造成了轟動。其訪臺期間和許多臺灣知識分子的會面，也造成了和製漢語在臺灣社會的廣泛流行。⁸¹ 梁啟超的滯臺時間雖然不長，但行程結束後，所造成的影響卻依然不減。距其來臺後十年，梁啟超的文

⁸⁰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頁 314。

⁸¹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頁 310-320。

章〈人生目的〉甚至還被刊載於《臺灣文藝叢誌》3年1號（1921年1月15日），演說詞〈為學與做人〉則刊於《臺灣文藝叢誌》5年4號（1923年4月25日），詩刊6卷1號。⁸²除了《臺灣文藝叢誌》外，《詩報》、《臺灣詩薈》，甚至《風月報》等，也都在其訪臺後刊登過梁啟超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臺灣知識分子中，如賴和、黃旺成、林獻堂、甘得時、葉榮鐘、黃得時、黃純青等，都有梁啟超的著作。黃得時在〈梁任公遊臺考〉一文，敘述其父親黃純青曾嗜讀《飲冰室文集》、《墨子學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等梁啟超的專著。不僅如此，黃純青還因此寫了〈孔墨並尊論〉，引發軒然大波；而當時黃純青所寫的文章，則完全模仿梁啟超的文風和作法。⁸³有趣的是黃純青、黃得時父子，都是投稿《臺教會》雜誌的常客。其摹寫梁啟超的文章刊登在《臺教會》雜誌一事，代表著「殖民地漢文」、「帝國漢文」、「新民體」之間，存有相當程度的通融性。類似這種一方面閱讀梁啟超，一方面投稿《臺教會》雜誌的行為，也可見於其他的臺灣知識分子，並非黃純青父子的特權專利。根據王詩琅轉述洪元煌所言：日治時期影響自己世代（洪元煌所代表的臺灣文化協會世代）最深遠的便是梁啟超。王詩琅本人也認為，在洪元煌的世代，《飲冰室話集》幾乎是所有臺灣知識分子必讀之著作。⁸⁴

梁啟超在臺灣的影響力歷久不衰，但隨著時間的翻轉，臺灣知識分子對於這位中國啟蒙家的憧憬，似乎有了一些渲染或移情的現象，亦即以梁啟超為先驅的中國白話文運動。

中國白話文運動在臺灣開始被認為是一個文化、社會議題，乃起源於大正12年（1923）陳端明刊登在《臺灣青年》中的論文〈日用文鼓吹論〉。然而，在這篇論文發表之前的大正10年（1921）9月第3卷1期中，《臺灣青年》刊登的募集論文廣告，對於投稿者文體的規定卻是「文體隨意」。在1923年1月黃呈聰確

⁸² 許俊雅編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7），頁191-192；黃得時〈梁任公遊臺考〉，《臺灣文獻》16:3（1965年9月），頁1-68。由於《臺灣新聞》多數已佚失，所以我們無法看到1930年黃純青（1875-1956）在《臺灣新聞》的〈孔墨並尊〉連載。翁聖峰，〈一九三〇年臺灣儒學、墨學論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19:1（2006年3月），頁1-21。

⁸³ 許俊雅編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頁192。

⁸⁴ 王詩琅，〈臺灣民族運動史〉，《華學月報》7（1972年7月），頁36。

切提出〈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臺灣》4卷1號）這篇論文前，臺灣知識分子雖然已陸續提出一些以改善傳統漢文作為進行近代化手段的意見，但此時包括陳端明、蔡培火等，都沒有將自己所期待或使用的文體明確定位為中國白話文。甚至到了1923年4月《臺灣民報》創刊詞中，慈舟也就是曾任《臺灣青年》總編輯的林呈祿，依然還是把這個雜誌的文體稱為「平易的漢文」。

很清楚的，在明治36年（1903）「殖民地漢文」開始規模性、經常性出現在臺灣媒體後的二十年之間，新世代知識分子雖然和傳統文人胡南溟一樣，都察覺到自己的文體有了變化，但是針對這個新文體卻沒有給予一個固定或統一的稱謂。在《臺灣青年》、《臺灣》或《臺灣民報》所刊載的文章，通常是將它定位或自稱為「日用文」、⁸⁵「平易漢文」、「白話文」、「經過五四運動後將會在中國流通的現代的漢文」。⁸⁶ 這些臺灣知識分子們，反對古典漢文的態度非常明確，但也都清楚地自覺到，自己現在所書寫的文體，已經不再是往昔的古典漢文；但是對於當下，這個新文體到底是什麼，要如何定位或稱謂，態度卻相當曖昧。儘管如此，從臺灣文化發展貫時性的角度來看，所謂「明治體」、「日用漢文」、「平易漢文」、「文體隨意」、「白話文」、「現代的漢文」等一連串的不同稱謂，其所指涉的內涵應該是「殖民地漢文」，而非「中國白話文」。

就如同臺灣的中國白話文運動在一開始便引發了所謂新舊文學論戰這一實情，其所顯示的意義在於：1920年代臺灣人自稱的中國白話文與標準的中國白話文之間，其實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但即便如此，這個文體依然被使用者「認為」就是中國白話文。之所以會產生如此的「認知」或「誤解」，原因之一在於：在《臺灣民報》的大力鼓吹下，1920年代中國白話文在臺灣的文化界中，已跳脫出語文定義上標準、精確的問題層次，而被形塑成一種時尚流行、時髦的象徵。大正12年（1924）《臺灣民報》（2卷4號）中，刊載了〈對在臺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這篇論文，文中本名林耕餘的作者逸民便明言：

⁸⁵ 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臺灣青年》3:6（1922年1月），頁31-34。

⁸⁶ 蔡培火〈臺灣教育に關する根本主張〉，《臺灣青年》3:3（1921年9月），頁40-61；有關中國白話文運動，請參考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7）。

這一二年來在臺灣一般的青年同胞，在交際上所用的，或者在民報上發表意見的，……等々の文字！有非用白話文的不算是時髦，這等功勞不能不歸在熱心提供白話文的諸位先生身上去。⁸⁷

從逸民的文中我們得知，在 1920 年代臺灣的文化界中，中國白話文基本上是一個「時髦」的流行。這個「時髦」印象的形成，除了與梁啟超訪臺以及當時臺灣社會對於進步啓蒙的探討，也就是追求近代文明的風潮有關外，和媒體的鼓吹渲染也脫不了關係。以 1910 年代末期，《臺灣青年》創刊時這個被「認為」是中國白話文的文體業已存在的事實來看，中國白話文其實是在社會啓蒙風潮以及新生代知識分子的強力鼓吹效應下，所萌生的一種憧憬或想像。從 1920 年代開始，透過頻繁強烈的輿論渲染張力，即經過張我軍、黃呈聰、黃朝琴等實際具有中國留學或旅行經驗者，以《臺灣》或《臺灣民報》為發聲管道、大力推行和宣傳後，才一路從「明治體」、「日用漢文」、「平易漢文」、「文體隨意」、「白話文」、「現代的漢文」，改稱為中國白話文。

更具體的說，1920 年代流通在《臺灣》或《臺灣民報》的「中國白話文」，與其說是一種語文上嚴格精確的定義或描述，不如說是媒體主導與輿論催化下所產生的一種稱謂上的置換結果。以文體的形態來說，所謂中國白話文，其實是披著一件時髦外衣的「殖民地漢文」；以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則是一個後設，也就是事後才追認、命名的結果，而不是一開始便明確存有既定目標的實踐成果。嚴格說來，中國白話文這件外衣雖然擁有時髦、進步的印象，卻與臺灣文化、社會的發展軌跡或尺寸不盡契合。這個文體在「名」與「實」之間的落差，則從爾後一些自認為能寫正確中國白話文者，如張我軍、施文杞、⁸⁸ 逸民等針對刊登在《臺灣民報》中的那些所謂中國白話文作品的批評，得到印證。⁸⁹

大正 12 年（1924）施文杞在《臺灣民報》2 卷 4 號中，寫了一篇於文章開頭

⁸⁷ 逸民，〈對在臺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臺灣民報》2: 4（1924 年 12 月 5 日），頁 5-7。

⁸⁸ 施文杞（1922-?），彰化鹿港人，曾於上海留學，1924 年投稿〈臺娘悲史〉於《臺灣民報》。施文杞也喜好新詩，曾與張我軍、張桔梗等人提倡文學改革，為臺灣文壇注入新風。

⁸⁹ 張我軍在〈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文中提出有關新文學寫法的批判，這個文章引發了所謂的新舊文學論爭。張我軍，〈糟糕的臺灣文學界〉，《臺灣民報》2: 24（1924 年 11 月 21 日），頁 6-7。

特別加上一段呼籲「臺灣人的研究白話文者注意——臺灣人的投民報者注意」的文章。在題為〈對於臺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的文章當中，施文杞不但與逸民一樣將當時臺灣人熱衷於書寫中國白話文的動機，解釋成是為了「出風頭」外，還批判這些文章是一種「變態的白話文」。不僅如此，其還強調：

「我社『臺灣民報』上，讀著有些臺灣人做的白話文，時常有不懂的地方，不單是文法弄錯，也有時用到完全沒有意思的語句。」「臺灣人做的白話文，當見（按：常見之誤）有用著日本語的名詞像『開催』『都合』這完全是日本語的名詞，要是沒學過日本語的人們，那裏知道這『開催』『都合』是什麼意思呢？」「如要研究白話文，最好多讀些白話的文，並來中國買些白話文的書去做參考，才會趕快地得著門徑。要是以自己地方的方言，寫做白話，也想做篇文章來出出風頭，那不獨是沒風頭出的，是反會鬧出笑話來呀！」⁹⁰

施文杞的批判，揭露出 1920 年代流行於臺灣的中國白話文之真面目：實際上是交混了日文與臺語的「殖民地漢文」。然而最諷刺的是，施文杞本身的文章，卻又是非常典型的「殖民地漢文」。為此，當施文杞、張我軍等這些自認為寫得一手「正常白話文」的人，在嚴正批評別人的中國白話文不夠標準時，其所創作的文章，卻也同樣被別人批判為不夠純正。例如被認為可能是由鄭坤五化名的鄭軍我，便數度執筆質疑如張我軍等整天掛在口中的所謂中國白話文，根本只是一種「平易文」而已。類似的質疑，也可見於連雅堂等人。⁹¹順便一提的是，鄭坤五本身便是《臺教會》雜誌的投稿常客。

鄭軍我、連雅堂等人的反擊與嘲笑，並非沒有道理。因為以《臺灣民報》這個極力標榜推行，並親身實踐中國白話文運動的雜誌為例，其所刊載的文章中，即有一大部分都是翻譯或轉載自中國的作品。如果扣除張我軍、謝春木、黃呈聰、黃朝琴等幾個少數留學過中國、能寫「正常白話文」者，以及利用一大堆筆名的編輯或記者發表大量的文章後，我們將不難發現：在這個被視為白話文運動大本

⁹⁰ 施文杞，〈對於臺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臺灣民報》2:4（1924 年 12 月 5 日），頁 8。

⁹¹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頁 108-109。

營的雜誌中，臺灣本土知識分子投稿的真正數量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多。⁹² 根據本文的初步統計：《臺灣民報》（1923-1932）每期當中，未署名作者、或署以「一記者、某記者」等明顯由編輯者、或社內同仁執筆的篇章約占 80%。若排除此類作品，而僅以能明確辨識作者的署名篇章來進行統計，則可發現《臺灣民報》中翻譯轉載文章約 169 篇，⁹³ 而由臺灣人自撰的文章約 1,756 篇。兩者比例雖然懸殊，但翻譯轉載文章的篇幅，通常比臺灣人自撰的文章要長很多。

在臺灣人自撰篇章中，曾留學、遊歷中國者約佔 35.94%，未曾到過中國者也就是臺灣本土知識分子僅約佔了 12.64%，無法判斷者最多，共占有 51.42%（參見附表五）。令人玩味的是，《臺灣民報》中曾留學、遊歷中國的投稿者當中，如林呈祿、楊肇嘉、蔡培火、醒民、黃旺成、王敏川、陳逢源、謝春木、黃呈聰等，大致都出身自國語學校。其所寫文章之「中國白話文」純度雖然不高，卻幾乎都與啟蒙、進步的近代化議題有關。⁹⁴ 這些人在缺乏正式教育、辭典的支援，以及時空隔絕的艱難條件下，還能寫出神似中國白話文的文章，甚至想像或默認自己的文體便是所謂的中國白話文，最大理由和基礎在於：這一批新世代的臺灣知識分子不但都學習過日文，而且幾乎都與《臺教會》雜誌有關，在其求學或畢業後的生活經驗當中，都有接觸過「帝國漢文」和「殖民地漢文」的經驗。

雖然這些知識分子也都去過中國，但其訪中的時期幾乎都在 1910 年代，也就是「殖民地漢文」業已出現、或滲透到臺灣媒體之後的事。以時間的先後順序來思考，這些人是帶著「殖民地漢文」去「祖國」，而不是去「祖國」學習中國白話文，繼而將它帶回臺灣來使用或推廣。更具體的說，正因為有了「殖民地漢文」做為文體媒介，林呈祿、楊肇嘉、蔡培火、黃旺成、陳逢源等才得以在中國順利與當地

⁹² 本文的統計是以 2008 年劉海燕在日本臺灣學會發表的論文中所統計的翻譯文學數量為主，再進行其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是臺灣人執筆的篇數以及雜誌總篇數之統計；最後，則是合併兩者的統計數據所換算出的結果。參見劉海燕，〈台灣新文學における中国新文學の影響：『台湾民報』（1923～32）における中国新文学作品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收於日本台湾学会編，《日本台湾學會報告論文集》（東京：日本台湾学会，2008 年 5 月），頁 142-150。

⁹³ 而根據筆者的觀察，《臺灣民報》翻譯轉載文章的篇幅通常比較長。

⁹⁴ 有關《臺灣民報》前身的《臺灣青年》與國語學校之間的關連，請參考陳文松，〈「校友」から「台湾青年」へ〉，頁 138-163。楊肇嘉 1937 年底避居日本，1943 年轉赴中國上海經商，在日資大東實業公司工作；謝春木 1928 年曾專程回大陸參加孫中山先生之奉安大典，1931 年 12 月舉家移往中國，於上海創設「華聯通信社」；黃旺成多次到過大陸，1934 年返臺，投入臺灣史上第一次地方選舉。1947 年因二二八事件避居上海；林呈祿 1917 年 2 月赴中國湖南省立政治研究所任教授，翌年 7 月辭職，回東京投入臺灣的民族運動；蔡培火 1937 年往東京避開戰禍，1942 年轉赴上海，1946 年回臺。

人進行交流與溝通。這個文體經驗，在某些意義上其實與梁啟超的訪臺是相當類似的。或許也正因為這個交流溝通的成功，才強化了這些臺灣人對於中國白話文的「想像」。

當然，文體上的「認為」或「想像」，往往是脆弱、暫時而漂移不定的，其必然要面對現實社會的挑戰。而中國白話文的挑戰，來得不但快速也持續得久。

(二)從「殖民地漢文」到臺灣話文

語文是為了因應人類的生活而存在，一個成熟的文體往往隨著時代或社會追求的價值和目標之變動而不斷進行調整、轉換，以便滿足社會中大多數成員的需求。換言之，一個廣為民眾所接受的文體，必須兼顧社會上不同階層、地域、性別成員的生活需求，以反映這些人的思想、經驗或心聲。為此，這種文體除了必須要能摩登而時髦的表達現代、科學、理性的普世價值與議題之外，也必然是一個能夠傳遞獨特生活經驗，亦即表達在地文化、傳統、過去、庶民、感性的工具。更具體的說，語文不能只被一部分都市中的知識分子所獨占，或只是一種知識分子「想像」世界的工具載體，而必須讓社會底層的販夫走卒、農漁民們也能共同參與或擁有。也就是說，一個成熟的文體，除了做為政治運動、社會評論、時事報導的傳遞手段，或在小說中被當作描述知識分子行為或心理的載體，也同時必須是一種能充分表達農漁村中各種階級成員，特別是社會底層人們思維或生活經驗的工具。不僅如此，甚至要讓這些與進步、啟蒙或近代文明有些微距離的階層，也能透過這個文體閱讀，甚至書寫。據此，一個成熟的文體，往往必須在社會中具備著全方位的存在。⁹⁵

然而做為一個時髦的文體，1920年代的中國白話文和臺灣農漁村的民眾之間，卻存在著相當大的隔閡。因為日治時期，啟蒙與進步雖然是臺灣人的憧憬與希望，卻不表示當時整體的臺灣社會，業已均質的進入近代文明之世界。換言之，一個成熟的文體，如果必須兼顧文／白、文語／口語，以及時髦／文化、都市／鄉土、現代／過去、科學／傳統、理性／感性等全面性功能的話，中國白話文所不足或欠缺的，顯然是後者的功能。因為在性別、階級、地域、學歷差異的前提下，「中國白話文」基本上是知識分子的文體。其在反映臺灣農漁村或社會底

⁹⁵ 陳培豐，〈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頁190-237。

層生活經驗的能力上，相對來說是較為薄弱的。

大正13年（1924）9月到11月，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發表了一連串批判所謂舊文學，也就是沿襲明清以來，使用古典漢文創作傳統文學的文章，並順沿近代文學發展的主張，提倡以中國白話文來創作新文學。⁹⁶ 不過，臺灣的中國白話文運動隱藏著很大的問題。因為對於一部分中國人來說，使用白話文或許可以達到「我手寫我口」的文學近代化目的；但對臺灣人而言，其日常生活用語既然不是白話文的音源北京話，以白話文做為文學書寫工具，反而凸顯出中國白話文和臺灣話之間的落差。這其實也意味著：臺灣人越強調中國白話文，則距離完成「言文一致」的現代化目標，也就越遙遙無期。而在偏離了臺灣話這個大多數臺灣人的口語體，臺灣農漁村中的文化、過去、傳統、庶民生活或感性，當然也很難在臺灣的中國白話文作品中獲得充分的表達。

事實上，大正 11 年（1922）臺灣文學界，便出現第一篇近代小說鷗的〈可怕的沈默〉，同年謝春木也發表了〈彼女はどこへ〉（〈她往何處去〉）。這兩篇小說，前者以中國白話文，後者則是用日文做為書寫工具；其內容或作者都和留學生有關，但都不是使用在地的臺灣話做為書寫工具，更不是以農漁村的庶民世界為題材。謝春木和鷗的作品，反映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精神與內涵，也凸顯出其隱藏在內部的矛盾以及脆弱。因此在 1920 年代後期，當臺灣的左翼文學風潮興起，社會底層民眾的喜怒哀樂成為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後，臺灣人對於中國白話文的文體想像開始幻滅。同時，這個想像的幻滅也預告了：臺灣的社會大眾對於一個符合臺灣身體尺寸之新衣服，也就是具有口語體要素的新文體之需求與期待。而其正式浮上歷史檯面的時機，則是「中國白話文」出現後大約 7 年，即 1930 年代的事。

1930 年代，臺灣發生了所謂鄉土文學以及臺灣話文運動，同時也引爆了一場規模頗大的論戰。臺灣話文運動的發生原因，主要在於：有一部分臺灣人，針對 1920 年代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正當性、適切性提出質疑和挑戰；為此，其主張應該使用臺灣話文，也就是閩南話來做為文學創作的工具。對於提倡臺灣話文的人來說，臺灣文學應該要以臺灣作為描述範圍，特別是要進入鄉村，以被社會或統治

⁹⁶ 《臺灣民報》創刊後，張我軍發表了〈糟糕的臺灣文學界〉2: 24（1924 年 11 月 21 日），頁 6-7、〈為臺灣的文學界一哭〉2: 26（1924 年 12 月 11 日），頁 10-11、〈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3: 2（1925 年 1 月 11 日），頁 6-17、〈揭破悶葫蘆〉3: 3（1925 年 1 月 21 日），頁 9-10 等多篇論文。

者壓榨的農漁民或庶民作為描寫對象。為了這樣的理由，原先受到提倡的中國白話文，並不適合作為臺灣文學的書寫工具。

在這場為期約 5 年的論戰中（1930-1934），參與人數之多和涉及媒體之廣、討論議題與層面之複雜，都是臺灣史上前所未見。⁹⁷ 不過在這場出現過上百篇文章、堪稱臺灣知識分子百家齊鳴的論戰中，卻出現了一個有趣而矛盾的現象。⁹⁸ 這個現象就是：兩派意見相左的陣營，為了維護和實踐自己的主張，雖然努力地使用自己所認定的語文，即中國白話文以及臺灣話文來進行筆戰；然而非常諷刺的是，這些人雖然主張自己的語文不同於對方，卻在為期 5 年之久的論戰期間，在沒有動用翻譯的情形下，卻又可以理解或消化對方的文意。⁹⁹ 換言之，這場論戰的特點其實在於：參戰的正反兩方，雖然以主張兩個不同文體各自獨立存在的正當性做為出發點，但爭論的過程中，兩個文體之間的類似性、可換性，卻又剛好否定了雙方堅持己見的必要性。

我們如果仔細閱讀郭秋生這位臺灣話文派大將下列的文章，不難發現臺灣話文運動的目標之一，其實是要把當時被施文杞、張我軍、逸民等批判為「變態的中國白話文」加以正常化、常態化、口語化，並賦予市民權。

中國的白話文可完全在臺灣繁殖嗎？既言文一致為白話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絕地方文學的方言的特色，那末臺灣文學在中國白話文體系的位置，在理論上應是和中國一個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實質上現在的臺灣想要同中國一地方做同樣白話文體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嗎？譬喻個例啦！汽車、自來水、自來水筆，這在中國白話文的政治限域內通通有一致的必然，但是這必然卻不能延長到臺灣人用的自動車、水道、萬年筆啦！設使理想中國白話文的人說，像自動車、水道、萬年筆這樣，何妨當白話文體系的臺灣獨特的方言，那末阮、恁這種臺灣話，打算也是不便否認才是。¹⁰⁰

⁹⁷ 有關這個論戰的詳細經過，請參考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4），頁 318。

⁹⁸ 以中島利郎所彙編的《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來計算，光是書中所收錄的相關論文便有 74 篇；當中，僅郭秋生的〈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從 1931 年 7 月 7 日開始的《臺灣新聞》連載過 33 回。

⁹⁹ 陳培豐，〈識字・閱讀・創作和認同〉，頁 108-110。

¹⁰⁰ 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臺灣新民報》，1931 年 8 月 29 日，頁 11。

郭秋生的文體中，臺語的語助詞以及日語均明顯增加。在日語普及率快速提昇的1930年代，日語本身特別是和製漢語逐漸成為臺灣人日常生活的用語。「臺灣話文」中日語成分的增加，對臺灣人而言意味的是文體口語化的實踐。不過很明顯的是所謂臺灣話文，除了大量反映臺語的生活口語外，其骨幹也就是「文」本身，依然存有濃厚的「殖民地漢文」之影子。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意見相左的兩派陣營，即便是使用了自己認定的「不同」語文，但在沒有動用翻譯的情形下，可以理解或消化對方文意的理由所在。

換言之，以臺灣內部的文化脈絡來看，中國白話文其實便是從「殖民地漢文」發展出的文語體，而臺灣話文則是以「殖民地漢文」為基礎的臺語口語體。當然，這個相互看得懂對方文章的事實告訴我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的確是存在著一個可以連結兩個文、口語體，以便讓許多人可以相互理解溝通的仲介文體。對於當時的臺灣人而言，這個文體有如空氣般的自然，不知道來自何方、如何形成，但卻被賦予不同身分籍貫的想像。這個現象提醒我們：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主要差異，與其說在於文體本身，不如說在於書寫者的立場、目的或想像。從臺灣話文論戰的參加者，即包括主張中國白話文和贊成臺灣話文者，很少有人去過中國，卻幾乎全都受過公學校與書房教育，¹⁰¹也都曾經是《臺教會》雜誌的投稿者這個事實來看：這兩種文體其實都同樣衍生自「帝國漢文」，其共同基礎或前身，說穿了就是「殖民地漢文」。¹⁰²

就像「帝國漢文」曾在日本國內發揮過仲介大、小新聞文體的功能般，「殖民地漢文」在日治時期也一直擔任「萬人皆宜」的角色。在1910年代，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或臺灣傳統文人與新世代知識分子之間的折衷文體，在1920年代，則是臺灣人想像中的中國白話文之主要內涵。至1930年代，又成為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之間共同基礎。

臺灣話文論戰彰顯出臺灣做為東亞殖民地的特異性。這個論爭的重點，不在於最後誰勝誰負，而在於這個論爭過程中凸顯的事實，便是：「殖民地漢文」在經過一連串淬鍊與演化後，其表記形態漸趨穩定、流通範圍也持續擴大、書寫載

¹⁰¹ 張我軍、黃朝琴、黃呈聰等真正去過中國者，在這場論戰中幾乎都保持沈默。

¹⁰² 臺灣話文論戰的參加者中，不屬於公學校教育畢業者或不曾經在《臺教會》雜誌投稿者，幾乎只有林克夫一名。

體的功能也迅速增強。更具體的說，透過中國白話文派與臺灣話文派，雙方人馬在這次論戰中實際操練，得以確定1930年代「殖民地漢文」不管在表記形態、流通範圍或載體功能上，均已成熟到足以支持一個以近代化為議題、且又是長時間大規模的論爭。於是，「殖民地漢文」的成熟也提供我們一個新的思考方向，讓我們得以重新解釋日本政府為什麼會在這個論戰結束後三年，也就是昭和12年（1937）毅然絕然地「禁止」漢文欄。

1937年日本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報刊雜誌中的「漢文欄」。¹⁰³ 從最近的一些研究得知：統治者並沒有「全面禁止」漢文，其所要「禁止」的對象，其實有明顯的針對性。因為當時被禁止的對象，並不包括漢詩這個漢文欄中的主要文類，以及《風月報》這個以消遣娛樂為主要宗旨、全臺發行量最大的漢文雜誌。從一些跡象中顯示：這個政策主要是針對《臺灣民報》、《臺灣時報》等這些既曾經提倡中國白話文，又是臺灣話文論戰之主要戰場，同時也具有明顯抵抗色彩之刊物的漢文欄而來。從臺灣總督小林躋造在「禁止」漢文欄時所發布的以下聲明中，也可以確知：對於統治者而言，1930年代這些經常刊登在《臺灣民報》或《臺灣時報》中的「殖民地漢文」，已經不再是漢文、中國白話文或臺灣話文，而是如假包換的「臺灣語」、「臺灣文」。

歷任的總督為了同化均努力於普及國語教育，徹底宣揚皇國精神。但現實上為了考慮讀者以便宜之計，當局並沒有立即在新聞、雜誌全面廢止臺灣語・臺灣文。但實際上大家均對於早晚廢止漢文欄都存有定見。這只是個時機的問題而已。¹⁰⁴

換言之，日治時期雖然沒有教育做為普及後盾、也缺乏辭典這個語文標準規範工具，但憑藉著媒體，特別是《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等「漢文欄」做為仲介、創新、交混、搓揉、拉扯及演化的場域，一個符合臺灣社會尺寸，也就是「萬人皆宜」的「中性」文體，套用小林躋造總督的說法——「臺灣語」和

¹⁰³ 有關漢文欄廢止，日本學者河原功與中島利郎都有相關研究。中島利郎認為漢文欄雖然消失、但從臺灣總督府相關單位的內部文獻一直沒有找到「禁止」的資料，而懷疑這是否是行政上的強制「禁止」，有更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¹⁰⁴ 小林躋造，〈漢文欄廢止に關する小林總督の聲明〉，《詔勅・令旨・諭告・訓達類纂》（臺北：臺灣總督府，1941），頁768。

「臺灣文」正逐漸趨於成熟，並持續擴散。這個已然形成的文體共同體，或許才是統治者必須管制、禁止「漢文欄」的真正原因所在。

八、結論

做為一篇文體歷史的研究，本論文之目的是去探討日治時期，曾經存在或流通在臺灣社會的各種文體，其有什麼特徵？在文化、政治上具有什麼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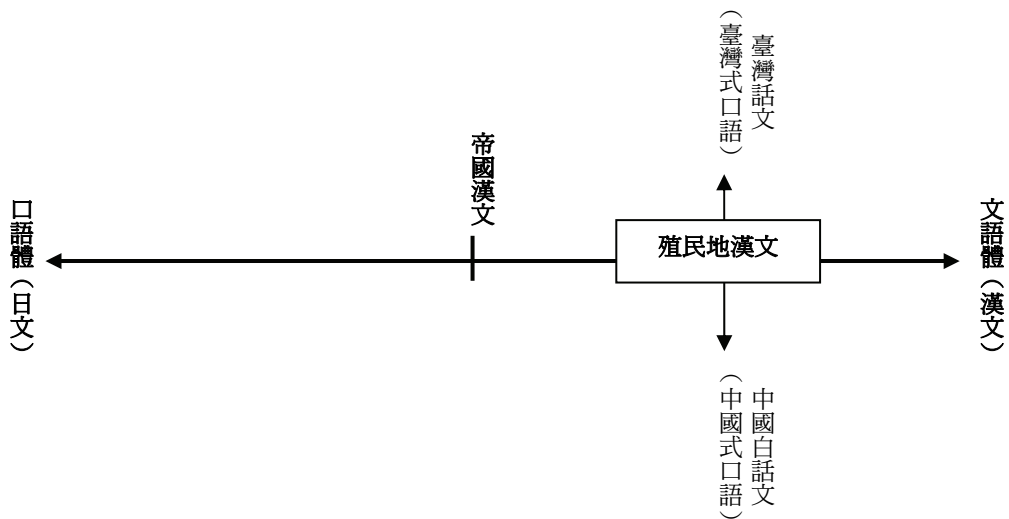
當然各種文體之間，除非經過龐大文例的分析統計調查，否則很難清楚呈現或歸納其差異。不過，以東亞漢文脈的角度來看，日治時期臺灣的一些語文運動，之所以能在日本統治下成立，「殖民地漢文」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1920年代流通於臺灣知識分子之間的「中國白話文」，所以能達到雖不是名符其實，卻與本尊「神似」的境界；或1930年代不用翻譯便能進行臺灣話文論戰，其關鍵全都是在於「殖民地漢文」，這個起源自《臺教會》雜誌，影響各種媒體文體之磁場的存在。日治時期，觸動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另一要因，是梁啟超訪臺後在臺灣文化界所留下的影響。梁啟超訪臺的餘韻，讓原本在東亞殖民統治下構成因素混雜、卻無清楚所屬的「殖民地漢文」，披上了中國白話文這個語文共同體的想像外衣。而由於1920年代臺灣的中國白話文，充其量只是披上「中國」這個語文共同體想像外衣的「殖民地漢文」，因此當臺灣人察覺到這件外衣並不符合自己身體的尺寸時，便自然的主張要更換合身的衣服。1930年代的臺灣話文論戰，便是臺灣人重新自我省視後所引發的論爭。

透過上述這些文脈以及歷史意義的探討，我們應該可以理解：漢字漢文來自中國，卻不一定便等同於中國。特別是在近代以後，做為東亞各地域共構而成的文體，漢字漢文可以、也可能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出現在不同的歷史舞台，並被不同時代、不同國籍的人所接受、使用、改造、想像或賦予各種任務。以東亞漢文脈的角度來思考，「臺灣語・臺灣文」雖是一個在複雜歷史經驗下由許多要素共構出來的結果，卻具有自己清楚的文化脈絡。這些經驗脈絡，不僅包括傳統的中國，更有近代的日本與臺灣自身的本土。

對於漢字、漢文所蘊含的多面意涵，最敏感的恐怕應該是日治時期的統治者

了。隨著時代背景或政治情勢的不同，在支配臺灣時，日本有時是漢文的受益者，有時卻又變成受害者或反對者，有時則又進退失據、不知所措。這或許是日治時期統治者雖然極力推行「國語」教育，但到領臺 42 年後的昭和 12 年（1937），卻斷然「禁止」漢文欄的主要原因。

「殖民地漢文」是東亞內部殖民的文化現象。其因漢字漢文圈的種種類似而成立，卻又被想像成中國白話文，最後則因漂游向了臺灣，凸顯出其與日文之間的差異，而在皇民化運動時被壓制。



圖二 「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之示意圖

附表一：《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欄中的翻譯文章篇數

年代	漢文欄篇章數	翻譯文章篇數
1903 (第 10-21 期)	338	5
1904 (第 22-33 期)	268	22
1905 (第 34-45 期)	286	19
1906 (第 46-57 期)	234	12
1907 (第 58-69 期)	267	4
1908 (第 70-81 期)	348	5
1909 (第 82-93 期)	414	21
1910 (第 94-105 期)	412	25
1911 (第 106-116 期)	383	16
1912 (第 117-128 期)	183	12
1913 (第 129-140 期)	303	6
1914 (第 141-152 期)	410	5
1915 (第 153-163 期)	308	11
1916 (第 164-174 期)	420	10
1917 (第 175-186 期)	498	6
1918 (第 187-198 期)	293	5
1919 (第 199-211 期)	162	0
1920 (第 212-223 期)	175	3
1921 (第 224-235 期)	327	0
1922 (第 236-247 期)	187	1
1923 (第 248-258 期)	151	3
1924 (第 259-270 期)	155	8
1925 (第 271-282 期)	214	0
1926 (第 283-294 期)	255	0
1927 (第 295-304 期)	234	3

附表二：漢文欄中論說、雜錄、學術的日本人作者和臺灣人作者之篇數比較

年份	日本人	臺灣人	佚名、編輯者等	不明筆名
1903年	25	11	10	1
1904年	26	7	7	1
1905年	22	1	19	0
1906年	16	2	19	0
1907年	24	2	15	0
1908年	21	15	9	6
1909年	26	14	13	11
1910年	18	15	9	6
1911年	21	17	0	6
1912年	20	26	8	0
1913年	14	25	2	0
1914年	10	25	5	6
1915年	14	20	7	7
1916年	10	52	15	5
1917年	6	36	2	7
1918年	4	47	3	1
1919年	1	13	3	14
1920年	2	14	3	11
1921年	0	16	0	4
1922年	1	12	1	8
1923年	3	12	0	2
1924年	8	14	1	2
1925年	6	14	1	2
1926年	5	12	2	0
1927年	3	21	4	2

附表三：1903-1927年《臺灣教育會》雜誌(作者與臺灣民報重複部份)

附表三之一，日文欄部分（限於篇幅，各作者僅擇一列舉）

作者	篇名	期數	年代	文章屬性
江肖梅	三和弦	244	1922.9	文苑
林熊徵	臺灣教育之急務	222	1920.11	感想
黃純青	謹祝教育令發布	238	1922.3	文苑
張淑子	道德實際談(家庭の方面)	278	1925.8	
蔡培火	校內浴場の設置に就いて	146	1914.6	雜錄
顏雲年	新教育令頒行之福音	238	1922.3	感想

附表三之二，漢文欄部分（限於篇幅，各作者僅擇一列舉）

作者	篇名	期數	年代	文章屬性
李啟芳	送鹿港荒金教諭入營兵役	184	1917.9	文藝
李漢如、李逸村	博物零箋	24	1904.3	其他（譯作）
王敏川	遊虎山岩記	160	1915.9	文藝
黃旺成	晚釣	203	1919.4	文藝
陳芳園	登赤崁樓	204	1919.5	文藝
黃得時	伍員過昭關無悔道人評選	301	1927.7	文藝
楊肇嘉	論宜培植子弟	191	1918.5	雜錄
瘦鶴	蘇秦(錄前半)	233	1921.10	文藝
鄭坤五	夏扇(鶯社課題)無悔道人選	292	1926.10	文藝
醒民	內臺人共婚獎勵策	218	1920.7	雜錄（譯作）
胡南溟	自治制改善之急務	2: 15	1924.8	論說

說明：此調查表只列出一部分重複人員名單，因此僅提供參考。

附表四：臺灣教育會雜誌對譯文章篇數

年代	漢文欄全部篇數	翻譯文章全部篇數	對譯文章篇數
1902-1907	1393	62	12
1908-1927	5832	140	48

附表五：《臺灣民報》中作品類別數量表

類 別		篇章數量		篇章比例	
臺灣人自撰篇章	曾遊留中國	631	1,756	35.94%	100%
	未遊留中國	222		12.64%	
	無法判斷	903		51.42%	
翻譯轉載篇章		169			

引用書目

《臺灣教育會》

《臺灣青年》

《臺灣新民報》

《臺灣民報》

L・Hリュウ（著）、宮川康子（譯）

1995 〈語言横断的實踐・序説（上）〉，《思想》第 899 號，頁 21-44。東京：岩波書店。

1999 〈語言横断的實踐・序説（下）〉，《思想》第 900 號，頁 102-131。東京：岩波書店。

ロベール・エスカルピ（著）、末松寿（譯）

1988 《文字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東京：白水社。

子安宣邦

2003 《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

三屋大五郎

1907 〈大瀨氏教育學要義〉，《臺灣教育會》68: 5-9。

三屋恕

1907-1908 〈大瀨氏教育學要義〉，《臺灣教育會》65: 5-8、66: 3-6、67: 4-8、68: 5-9、71: 3-6、72: 5-7、73: 3-5、74: 3-7、76: 4-8。

上野左平

1903 〈大瀨氏教育學〉，《臺灣教育會》15: 3-6。

小林躋造

1941 〈漢文欄廃止に関する小林総督的声明〉，《詔勅・令旨・諭告・訓達類纂》。臺北：臺灣總督府。

小島憲之

1988 《日本文学における漢語表現》。東京：岩波書店。

土屋礼子

2002 《大眾紙の源流－明治期小新聞の研究－》。京都：世界思想社。

内田泉之助

1969 〈原漢文か書き下し文か〉，《文法》1(13): 17-20。

王詩琅

1972 〈臺灣民族運動史〉，《華學月報》7: 32-37。

加賀野井秀一

2002 《日本語は進化する：情意表現から論理表現へ》。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加藤周一、一海知義

2005 《漢字・漢語・漢詩：雑談・対談・歓談》。京都：かもがわ出版。

加藤徹

- 2006 《漢文の素養：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東京：光文社。

伊藤喜代治

- 1997 《近代日本語と漢字》。東京：明治書院。

平井昌夫

- 1948 《国語国字問題の歴史》。東京：昭森社。

安田敏朗

- 2006 《辞書の政治学：ことばの規範とはなにか》。東京：平凡社。

西谷修

- 1999 〈《国民》の「翻訳」〉，《國文學》43(10): 50-53。

佚名

- 1902 〈明治三十五年之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會》9: 2。

- 1903 〈會報〉，《臺灣教育會》10: 62-63。

村山吉広

- 1980 〈漢文脈の問題：西欧の衝撃のなかで〉，《国文学》，25(10): 40-45。

杉井六郎

- 2005(1977) 《徳富蘇峰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李承機

- 2003 〈殖民地新聞としての《臺灣日日新報》：「御用性」と「資本主義性」のはざま〉，《殖民地文化研究》2: 163-181。

- 2004 〈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の分裂〉，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頁 201-239。臺北：播種者文化出版社。

東海散士

- 1989(1885) 《佳人之奇遇》，日本近代思想體系 16 文體。東京：岩波書店。

林翠鳳

- 2004 《鄭坤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波多野太郎

- 1971 〈漢文訓読の問題と助辞〉，《文法》3(3): 48-59。

波多野鹿之助

- 1953 《中國と日本における近代文學》。東京：白楊社。

邱雅萍

- 2007 〈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面貌」〉。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室屋麻梨子

- 2007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懿琳

- 1999 〈江肖梅與古典文學〉，《竹塹文獻》13: 17-21。

柳父章

1980 《翻譯語の論理：言語にみる日本文化の構造》。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2004 《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高岡武明

1902 〈公學校ノ修身化ニ就キテ〉，《臺灣教育會》4: 1-20。

原田種成

1971 〈漢文法の要点〉，《文法》3(3): 10-19。

翁聖峰

2006 〈一九三〇年臺灣儒學、墨學論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19(1): 1-21。

2007 《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清水賢一郎

2000 〈梁啟超と「帝國漢文」：「新文体」の誕生と明治東京のメディア文化〉，《アジア遊学》13: 22-37。

許俊雅（編注）

2007 《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許雪姬（總策畫）

2004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8 《黃旺成先生日記》，第 1-2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文松

2007 〈「校友」から「臺灣青年」へ：台湾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会雜誌』に見る「青年」像〉，《年報 地域文化研究》9: 138-163。

東門小史

1903 〈教育之三勢力〉，《臺灣教育會》11: 9-10。

郭啟傳、張子文（撰文）

2002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

陳培豐

2006 《「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の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收於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57-498。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2007 〈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收於陳芳明主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0-237。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7 〈識字・閱讀・創作和認同：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3: 83-111。

陳淑容

- 2004 《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

張勝彥總纂

- 1989 《臺中縣志》。臺中：臺中縣政府。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

- 2000 《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黃美娥

- 2004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2005 〈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發表於國家臺灣文學館主辦，「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頁 1-36。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黃克武

- 2008 〈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 1-42。

黃得時

- 1965 〈梁任公遊臺考〉，《臺灣文獻》16(3): 1-68。

森岡健二

- 2004 《日本語と漢字》。東京：明治書院。

楊永彬

- 2000 〈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出版社。

臺灣新聞社（編）

- 1935 《臺灣實業名鑑》。臺中：臺灣新聞社。

劉海燕

- 2008 〈台湾新文学における中国新文学の影響：『台湾民報』（1923～32）における中国新文学作品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收於日本台湾学会編，《日本台湾学会報告論文集》，頁 142-150。東京：日本台湾学会。

蔡茂豐

- 1977 《中国人に対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台湾を中心に》。臺北：撰者印行。

賴惟勤

- 1969 〈語學か文學か〉，《文法》1(13): 14-16。

齋藤希史

- 2005 《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2007 《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Multiple Imagining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Hanwen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Imperial Hanwen, Colonial Hanwen, Chinese Vernacular, and Taiwanese Vernacular

Pei-Feng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an-wu”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ccessive language movements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The Chinese vernacular movement of Taiwan occurred under Japanese rule not as a result of sudden or external factors. Instead, it was catalyzed by two major forces. First, the magazine Taiwan Education Organization laid the internal foundation of Colonial Han-wu. Second, the visit of Liang Qichao from Mainland China provided further impetus to the movement by linking Chinese vernacular with Colonial Han-wu to form an imagined common literary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n-wu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the imagined literary form was rooted in “Kundoku” (Chinese vocabularies spoken in Japanese) of Imperial Han-wu used in the post-Meiji Reformation era. It also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Colonial Han-wu to mix and merge with Chinese vernacular. To Japan and Taiwan, Imperial Han-wu and Colonial Han-wu were both agencies of the dual-structure languages in which people of different statuses, class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communicated.

Chinese vernacular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emerged as an imagined common literary style. Such cultural phenomenon was only recognized and named in retrospect. Since Chinese vernacular was not meant to be a goal to be achieved or a policy to be implemented, the language that was put into actual practice was the ill-defined Colonial Han-wu, which was developed from a hybrid of complex factors. Consequently, upon realizing that the so-called Chinese vernacular was more imagined than real, unavailable

and unfit for their needs, Taiwanese intelligentsia naturally turned to other languages,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debate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in the 1930s.

Despite the intricate and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of Han-wu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it did exist as the common literary form for mutual communication. Yet, the lack of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system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is literary form to be standardized, normalized or systematized. Such certainty gave rise to its Multiple imaginings and transformations, a feature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 as a colony in East Asian region. Furthermore, this literary form formed the kernel of modern Taiwanese language.

Keywords: Enlightenment, Agency, Colony Han-wu, Taiwan Education Organization, Imagined Common Literary Style